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31期（民國115年3月），1-5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製作與想像海疆：〈北洋海岸圖〉與金國時期的海域認識[*]

盧正恒[**]

摘　要

〈北洋海岸圖〉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以滿、漢文標寫地名，涵蓋了朝鮮、渤海、東北、長江以北之空間。過去學界雖然已有關於此圖的初步討論，但對繪製背景、年代判定、政治文化意涵等，都仍有待進一步探討與釐清。本文將論證〈北洋海岸圖〉乃繪製於1632到1634年間，金國以山陰人白君可於十六世紀末所得、刻版印製、請王泮題跋的〈王泮題識天下輿地圖〉之衍生版本為基礎，繪製而成。此時正值皇太極調整東江諸島和沿海防禦策略，並且接納孔有德等降將，使金國得以重新對海洋展開較為主動的軍事行動。與此同時，金國亦以圖像化方式表現其特殊的地理觀：長白山三河分流，注入三處海域，象徵其文化與政治秩序的開展，而這並非沿襲漢人傳統的「四海天下」觀。是以，本文將在地圖知識傳播與帝國建構脈絡下，探討從嶺南、山陰、朝鮮至金國間地圖知識的流變與重製，並分析其最終如何在軍事、政治、文化層面上形構金國時期的海域認識。

關鍵詞：地圖研究、清史、明清鼎革、東亞知識傳播

[*] 本文爲國科會計畫「清代旗人群體的海疆認識與帝國建構」（110-2410-H-A49-034-MY3）之研究成果，撰文期間曾在幾個學術場合中分享，並蒙陳宗仁、林士鉉、吳政緯、孔令偉等學者在不同時期提供指點建議；其後復蒙陳建守教授鼓勵投稿、匿名審查人惠賜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年5月31日。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一、前　言

〈北洋海岸圖〉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爲紙本單色墨繪，圖上有滿、漢文地名，原圖尺寸長 213.3 公分、寬 211.8 公分，[1]該館對此圖之介紹：

> 本圖方位上北下南，內容東至朝鮮半島以東海域，南至長江，西至太行山，北至長城、混同江。內容涵蓋今朝鮮半島、遼東半島、山東、江蘇及河北、河南、安徽部分。地名為滿漢合璧，標註府、州、縣、巡司、驛站、山川、沿海島嶼等地名，相較於黑龍江周邊僅略記女直、蒙古地方，朝鮮半島描繪極為詳盡。據繪製風格及內容推測，本圖可能是清初受明代《大明混一圖》影響所繪製的地圖。[2]

此解說雖提供了豐富的訊息，但仍留下不少未解之謎：究竟是誰、何時、爲何繪製？爲何採滿文音譯、合併中文的地名標註方式呈現？又，地圖作爲兼具政治符號、文化意涵、地理空間的產物，此圖展現並反映了何種世界觀？

隨著疆域的拓展，當一個帝國接觸到更廣大的地理空間時，如何認識新控制的區域，是帝國建構（empire-building）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大清通過商人、間諜等提供的資訊、地圖以建立邊疆認識，也利用既有地圖添加滿文翻譯來擴充其對世界的理解。[3]過往研究多聚焦在 1644 年後清帝國建立廣袤疆域的過程，至於 1644 年前的狀況，卻因缺乏更合適的地圖史料而少有深入分析。此外，無論是自行繪製或據情報所畫的地圖，多牽涉到跨界知識傳遞的重要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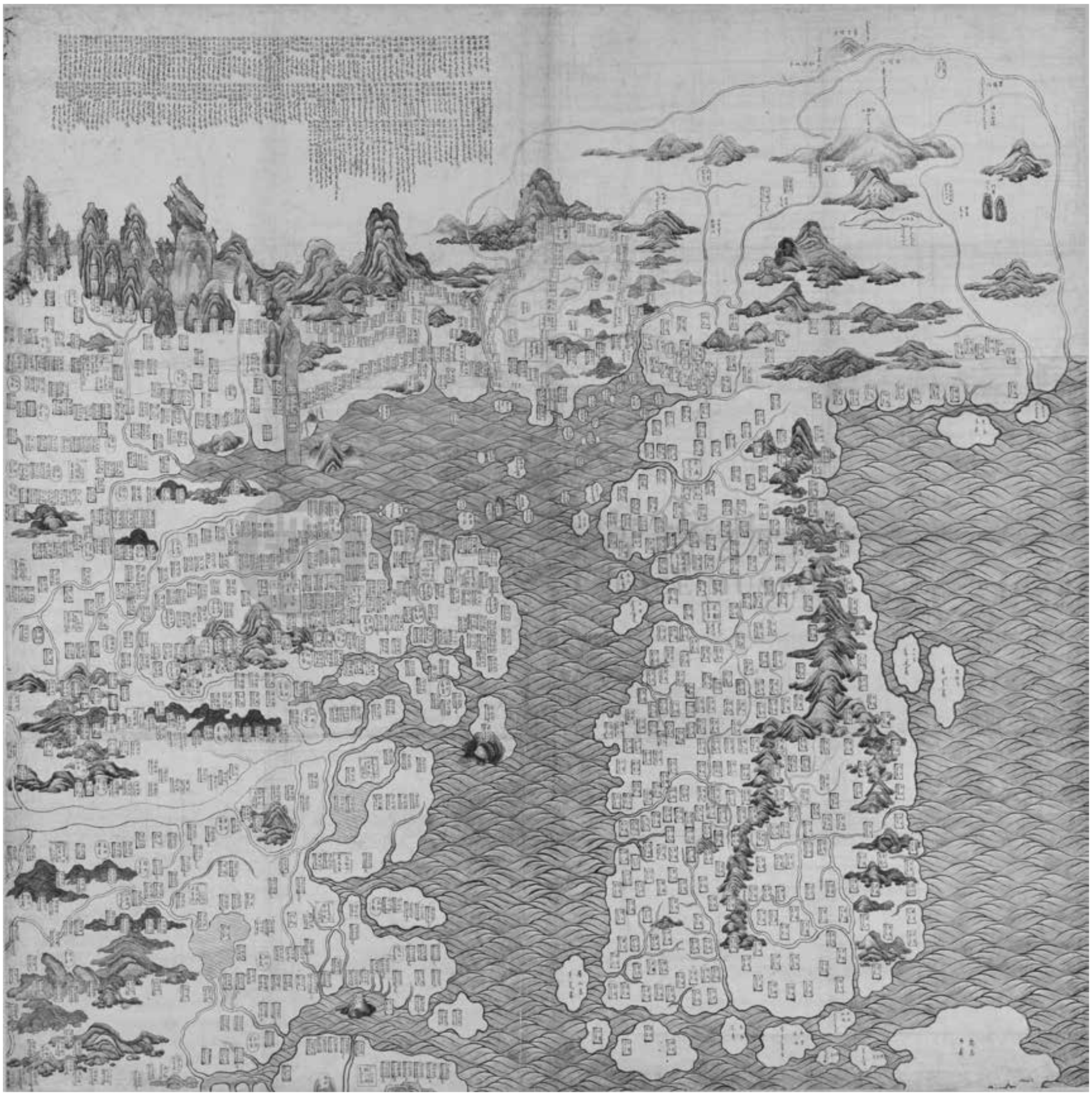
1　國立故宮博物院舊版網站曾標示此圖尺寸爲長 331.3、寬 221 公分，惟該數據爲裱框後大小；新版網站已經進行修正。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此圖之畫心尺寸。〈北洋海岸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平圖 021554。

2　參見盧雪燕主編，《故宮典藏古地圖選粹》（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8），上冊，頁 16-19。

3　可參見盧正恒，〈賊諜四出廣招徠：鄭氏諜報網、清帝國初期的東南海島認識與《臺灣略圖》〉，《臺灣史研究》，卷 26 期 1（2019 年 3 月），頁 1-58；孔令偉，〈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92 本第 3 分（2021 年 9 月），頁 603-648；Florin-Stefan Morar, “Relocating the Qing in the 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 The Manchu Translation of the 1603 World Map by Li Yingshi and Matteo Ricci,” *ISIS*, 109:4 (December 2018), pp. 673-694.

題，即地理知識如何從另一國家傳入清帝國，繼而被再製、形塑。職是之故，本文以〈北洋海岸圖〉爲主要文本（圖 1），探索金國時期如何通過多元地理知識繪製地圖，建立自身的海洋地理空間觀。

圖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洋海岸圖〉



資料來源：〈北洋海岸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檔案編號：平圖 021554。

本文將考證，〈北洋海岸圖〉的資訊約反映 1620 年代的地理狀況，但繪於天聰六年到八年（1632-1634）間，是〈天下輿地圖〉的重製版本，並且揉合了朝鮮、金國、中國的地理知識。[4]〈天下輿地圖〉源於十六世紀末山陰人白君可（？-？）所獲原圖，並在 1594 年由王泮題跋後重新刊印，是流傳於大明、朝鮮間的重要地圖。原圖應涵蓋自內陸到沿海的完整範圍，重新刊印的地圖則爲重新裱框的殘圖，僅存東北區域。但藉由觀察朝鮮、渤海及東北區域，可見金國汗皇太極（1592-1643, r. 1626-1643）在瓦解大明東江防線後，主動探索海洋、集中皇權，顯示其「帝國」意識及「三海」天下觀。通過探索此圖，本文試圖揭示金國在入關前、尚未更名「大清」之際，如何通過吸收明朝、朝鮮的地圖知識、補繪資訊，重構符合當時政治、文化脈絡的海域空間知識與地理認識。

二、知識交流和帝國建構下的地圖繪製

地圖所蘊含的訊息，已是歷史研究不可忽視的領域。[5]隨著各大博物館、檔案館陸續將地圖數位化，新史學方法和理論也爲地圖研究開啓新視界。本文即在新觀點與開放史料的基礎上，將〈北洋海岸圖〉置於早期近代東亞世界的地圖繪製、知識流傳、帝國建構等框架中加以考察。近年來，漢文地圖的研究極爲豐富，學界對滿文地圖也日益關注。盧雪燕、吳雪娟均曾系統性地介紹現存滿文地圖，亦包括〈北洋海岸圖〉，惟尚未對該圖有進一步探討。[6]吳雪娟

4　過去爲了區別完顏氏所建立的政權往往稱之爲「後金」，但根據研究，此政權之正式名稱應爲「金國」，可參見盧正恒、黃一農，〈先清時期國號新考〉，《文史哲》，2014 年第 1 期，頁 66-74。

5　黎志添，〈清代道光年間廣州城區祠廟的空間分佈及其意涵：以道光十五年「廣州省城全圖」爲考察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期 63（2016 年 7 月），頁 151-201。

6　吳雪娟，〈清代滿文輿圖概述〉，《滿語研究》，2006 年第 2 期，頁 49-52；盧雪燕，〈彩繪本滿漢文《甘肅地圖》考〉，《故宮學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輯 10，頁 440-457。盧雪燕也對故宮館藏地圖有深入介紹、分析與考述，參見氏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彩繪本《山西邊垣圖》與《山西三關邊垣圖》考述〉，《故宮學術季刊》，卷 30 期 4（2013 年 6 月），頁 105-153；〈明彩繪本《甘肅地方圖》考〉，《故宮學術季刊》，卷 29 期 1（2011 年 9 月），

認爲滿文輿圖需配合滿文中心觀點，通過整理史料、對照滿文檔案、以及邊疆人文、自然和族群狀況等三方向進行討論。[7]承志、林士鉉、魏巧燕等人延續此一架構，通過對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整理的滿文地圖、滿文檔案進行辨析與討論，同時揭示其所蘊含的政治、文化意涵。[8]但因缺乏地圖史料，對於入關前的金國是否已有繪製地圖、如何展現其空間認識及政治意圖，未有更深入的探討。

雖然關於入關前金國／大清的地圖研究仍較缺乏，但十六、十七世紀正值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地圖知識亦是其中重要一環。學界對此已有深入了解，例如利瑪竇引入西方製圖學（cartography）對大明、朝鮮、日本等地所造生的影響。[9]在利瑪竇地圖傳入東亞之前，明代地理學已形成文獻考察和野外調查兩套體系，而西方製圖學的傳入，則成爲第三種方法。[10]黃時鑒指出，利瑪竇地圖對中、朝、日世界觀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明代藉此將中國中心觀念導入世界地圖；相對而言，朝鮮所受影響較小，並未撼動其既有的中國中心觀。[11]楊雨蕾則提出不同意見，認爲利瑪竇地圖對朝鮮產生劇烈的影響，促使新地理

頁 101-146；〈地理之學，非圖不明──故宮所藏古地圖探微〉，《地圖：中華民國地圖學會會刊》，期 17（2007 年 9 月），頁 109-124。

7 吳雪娟，〈論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的命名〉，《滿語研究》，2019 年第 1 期，頁 92-100。另有一篇分析私人收藏滿文輿圖之原型爲《九路圖》與其他資料繪製而成，參見氏著，〈新發現的滿文本《黑龍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圖》〉，《東北史地》，2007 年第 3 期，頁 72-75。

8 承志，〈滿文《烏喇等處地方圖》考〉，*Central Asiatic Journal*, 59:1-2 (July 2016), pp. 179-238; 承志，〈満洲語で記された「黒龍江流域図」〉，收入藤井譲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編，《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 193-222；承志，〈尼布楚條約界碑圖的幻影──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卷 29 期 1（2011 年 12 月），頁 147-236；林士鉉，〈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院藏滿、漢文《臺灣略圖》簡介〉，《故宮文物月刊》，期 349（2012 年 4 月），頁 40-48；魏巧燕，〈《乾隆內府輿圖》滿語地名探析〉，《滿語研究》，2011 年第 2 期，頁 11-15。

9 秦國經，〈18 世紀西洋人在測繪清朝輿圖中的活動與貢獻〉，《清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37-44；黃時鑒，〈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百年回顧〉，《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2 期，頁 119-122。

10 王開隊，〈從地理文獻看明代地理學的發展趨向〉，《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 年第 4 輯，頁 116-123。

11 黃時鑒，〈從地圖看歷史上中韓日「世界」觀念的差異：以朝鮮的天下圖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圖爲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3 期，頁 30-41。

知識和宇宙觀出現，甚至在明清易代時引發華夷辯論的反省，進而推展後續西學、北學之誕生。[12]楊雨蕾進一步指出，東亞諸國長期存在交流地圖知識的傳統，以「琉球認識」和「東亞海洋世界」為例，強調朝鮮受到中國地圖的影響，包括本文將討論的〈王泮題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反映當時東亞海域活躍的資訊互動。[13]Alexander Akin 以跨區域（trans-regional）視角探討朝鮮、日本、大明在地理知識傳播與印刷文化的互動。[14]除了以利瑪竇及其輿圖學為核心的中西交流外，東亞區域的地圖知識傳播也頗受關注，而朝鮮作為情報中介與匯集的地位更為關鍵。Florin-Stefan Morar 通過分析〈兩儀玄覽圖〉的滿文標籤，論證滿洲人在獲得西方地圖知識後，以新的方式認識世界，並形成新的宇宙觀，同時藉此展示大清積極將自身置於全球秩序中的企圖。[15]

除了以地圖的視覺方式呈現地理知識外，東亞也存在交換情報、資訊的知識傳播體系。明清時期，朝鮮長期通過朝貢等外交活動打探東亞、東南亞諸國的訊息，逐步建立地理空間情報收集網絡，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關於琉球的詳實認識，即為一例。[16]沈玉慧指出，朝鮮使節常在北京收集琉球、安南、南掌等地的地理知識、政治狀況、外交局勢；[17]吳政緯也指出，朝鮮積極想方設法探知「滿洲」的情報，以增加對東亞世界的認識。[18]整體而言，朝鮮在十九

12　楊雨蕾，〈利瑪竇世界地圖傳入韓國及其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5 年第 1 輯，頁 91-98。

13　楊雨蕾、鄭晨，〈多元的認識：韓國古輿圖中的琉球形象〉，《海交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頁 40-56。

14　參見 Alexander Akin, *East Asian Cartographic Print Culture: The Late Ming Publishing Boom and its Trans-Regional Connection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1).

15　Florin-Stefan Morar, "Relocating the Qing in the 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 The Manchu Translation of the 1603 World Map by Li Yingshi and Matteo Ricci," *ISIS*, 109:4, pp. 673-694.

16　張存武，〈朝鮮人所知的盛世琉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0（1998 年 12 月），頁 1-27。

17　沈玉慧，〈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的琉球情報收集〉，《漢學研究》，卷 29 期 3（2011 年 9 月），頁 155-190；〈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臺大歷史學報》，期 50（2012 年 12 月），頁 109-153；〈朝鮮王朝海外知識的形成與累積——以《輿地圖．朝鮮日本琉球國圖》為例〉，《故宮學術季刊》，卷 34 期 2（2016 年 12 月），頁 107-163。

18　吳政緯，《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 219-255。

世紀以前對海洋世界的態度相對保守，此後則逐步擴展其視野。其「倭情報告」體制不僅爲大清提供關於日本與外洋的資訊，也成爲其修正海洋邊疆政策的資訊來源。[19]朝鮮在接收外來情資之餘，也會揀選符合其社會、政治需求的資訊。[20]此種情報選擇性機制，對本文的分析亦具啓發意義。

綜上所述，朝鮮作爲東亞、中西地理知識交流的重要節點，其在〈北洋海岸圖〉中所占的顯著篇幅，以及大量以朝鮮命名方式標註的地名等，都提示學者需要將〈北洋海岸圖〉放置於以朝鮮爲核心的東亞知識交流脈絡中。換言之，無論是由利瑪竇帶來的西方地圖學新方法，或是如朝鮮自身獲取的新空間知識，皆顯示地理知識的形成往往需要順應不同政治情勢與需求，從而也有程度不一的在地化現象。理解這些在地化現象，有助於揭示其背後所反映的政治與文化意涵。[21]

過去二十年，學界常視清代與同時期歐洲帝國同屬早期近代（early modern）帝國，並進行比較。自十五世紀以來，西方「地圖」已兼具航海、產權、軍事、商業、外交等多重功能，並在十七世紀成爲帝國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22]十八世紀起，歐洲展開對世界進行繪製、調查和分類的知識革命；十九世紀則以製圖作爲重塑帝國疆界、宣示領土主權的工具。[23]然而，同一份地圖

19 戴琳劍，〈燕岩朴趾源的海洋認識管窺〉，《赤峰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 11 期，頁 138-140；柳岳武、許文霞，〈清初朝鮮「倭情報告」政策之研究〉，《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6 期，頁 75-79。

20 羅樂然，〈東亞文化圈視野下朝鮮後期對澳門的認知〉，《成大歷史學報》，號 50（2016 年 6月），頁 1-36。

21 徐光台，〈明末清初西方世界地圖的在地化：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與熊人霖「輿地全圖」考析〉，《清華學報》，新卷 46 期 2（2016 年 6 月），頁 319-358。

22 Mauricio Nieto Olarte, *Exploration, Religion, and Empire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Ibero-Atlantic Worl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217-227; Lucy P. Chester, "The Mapping of Empire: French and British Cartographies of India and the Late-Eighteenth Century," *Portuguese Studies*, vol. 16 (2000), pp. 256-275.

23 A. G. Hopkins, "Globalization-An Agenda for Historians," in A. G. Hopkins, ed.,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p. 6. Virginia H. Aksan and Daniel Goffman, "Introduction: Situating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World," in Virginia H. Aksan and Daniel Goffman, eds.,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s: Remapping the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 Nour Nicole Dados, "Mapping Empir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Governmen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Empire," in Alena Strohmaier and Angela Krewani,

的不同版本在不同國家有不同意義。以〈皇輿全覽圖〉為例，對於法國而言，此圖是「傳教、貿易、科技考察」政策之體現，但對於大清而言，則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24]事實上，「地圖」不僅是知識生產的工具，也是帝國統治工具的一環，不論被實際利用，或僅是作為象徵，皆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涵。

從帝國的角度觀察清史，不得不提到濮德培（Peter C. Perdue）、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和何羅娜（Laura Hostletler）等學者，他們探討清帝國如何運用科學技術繪製精確的輿圖，並將其與同時期的歐洲製圖並論。[25]何羅娜主張，清帝國製圖學在使用和發展上展現出特有的認識論，運用地圖語言繪製帝國擴張後所納入的疆域，使地圖成為形塑與管理擴張帝國的工具。[26]馬世嘉（Matthew Mosca）通過宮廷和外國地圖，探討清帝國對印度的初步認識。[27]這些研究都嘗試探討邊疆地圖的繪製如何展現其帝國性質。[28]上述學者也常被歸入「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在帝國史、全球史、內亞史的範疇下，以非漢文材料觀察清代的內亞性質，已激起熱烈的討論和形成重大的貢獻。然而，如何將非漢文地圖研究的豐富成果與帝國史、全球史的研究結合，仍有待

eds., *Media and Mapping Practic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oducing Space*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27-44. J. H.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5.

24 林開強，〈清王朝國家疆域邊界意識簡析〉，《社會科學研究》，2010 年第 1 期，頁 160-162；毛傳慧，〈近代早期法國的遠東貿易與國家工商業發展──「傳教、貿易、科技考察」政策〉，《季風亞洲研究》，期 8（2019 年 4 月），頁 1-62。

25 James A. Millward, "'Coming onto the Map': '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Empire in Xinjiang," *Late Imperial China*, 20:2 (December 1999), pp. 61-98; Laura Hostetler, "Global or Local? Explo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o. 26 (2007), pp. 117-135; 濮德培著，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新北：衛城出版，2021），頁 461-475。

26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 3, 23.

27 Matthew 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8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7.

深化。舉例而言，前述如吳雪娟、承志等學者所探討的地圖，多大程度呈現了帝國性質與邊疆描繪？換言之，非漢文地圖如何呈現清帝國海洋疆域，似乎仍未獲得充分注意。

滿文地圖有其自身脈絡與研究領域，但與地圖知識交流、帝國建構的框架間的關聯，仍有待進一步探索。配合「新清史」的帝國視角，本文聚焦在滿漢文合寫的〈北洋海岸圖〉。過去對此圖的認識相當有限，諸如繪製時間、地點、圖資來源等問題，都尚未被深入討論。大明、朝鮮在十五至十七世紀對海洋及海外情報的收集已相當充分，但入關前金國時期的情況則相對缺稀。歸根究柢，除因入關前檔案材料的不足外，學界對金國時期與海洋關係的注意亦不足，形成清史研究一處空白。本文將從四個面向剖析此圖：首先，介紹此圖的基本架構，將其置於非漢文地圖的討論脈絡中，探討其滿文書寫的特點；其次，在知識交流與圖資結合的框架下，重新認識此圖的形成過程；其三，以帝國觀點來理解此圖繪製的歷史與政治背景；最後，聚焦於該圖所呈現的海洋世界，進一步理解清帝國在入關前的海洋認識，並將其置於海洋空間的創造（invention of maritime space）與「想像的地理」的範疇。

三、〈北洋海岸圖〉的內容與時間

〈北洋海岸圖〉所呈現的範圍包括朝鮮、渤海、東北、長江以北等地區，薛月愛在概述歷代東北地圖繪製時指出，清代地圖兼具輔助邊疆統治與反映社會生活的功能，但她並未針對此圖有任何討論。[29]鄭永昌認爲此圖應該繪於1637年以前，即金國、朝鮮關係良好時。[30]然而，關於〈北洋海岸圖〉的基本

29 薛月愛，〈東北地區歷代輿圖繪製情況初探〉，《齊齊哈爾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5期，頁113-115；〈康熙《皇輿全覽圖》與乾隆《內府輿圖》繪製情況對比研究——以東北地區爲例〉，《哈爾濱學院學報》，2008年第10期，頁106。

30 本文內容梗概曾於2023年2月以「再製海疆：入關前金國的海洋知識、文化、政治傳承與建構」爲題，在國史館進行演講。會後，其中一位聽眾將演講內容整理並發布至網路上，鄭永昌在其專文中曾參考、引用，大致認同筆者看法。參見鄭永昌，〈時代印記——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洋海岸圖〉試析〉，《故宮文物月刊》，期488（2023年11月），頁18-27。

資訊，例如繪製者、時間、繪製動機等，仍多未明。本節將考證此圖繪製的時間、作者、特色等，指出此圖爲女真、朝鮮人於 1632 到 1634 年所繪的作品。

〈北洋海岸圖〉實際上並非單純呈現「海岸」，也非聚焦於「北洋」，而是展示特定範圍的內陸、沿海區域。[31]其南界至長江口，西至冀州一線，北界雖然無明顯標示，但大略止於黑龍江、外蒙古地區、東側則至黑龍江出海口處。圖上標示驛站、衛所、山丘、湖泊、島嶼、寺廟、巡司、縣城、河流、族群，甚至亭樓、寺廟等。地名以單線方框、雙線方框、橢圓形或無邊框等四種方式區分，並以左右對稱平均書寫漢文與滿文地名。圖的上方以文字羅列標示奴兒干都司諸衛所。全圖地名均有漢文與滿文音譯，共 1,145 處，奴兒干都司地名則有 204 處。圖中也畫有長城及山海關建築延伸入「海中」的特色，沿途山峰描繪頗爲細緻，形狀各異。又以網線區分三種水域：海洋以大型波浪描繪，河水留白表示，湖泊則以類似交叉的小型波浪呈現。[32]

〈北洋海岸圖〉裱框後看似呈現一幅完整的圖繪。但圖的左上角寫有一滿文 amargi（北方），右下角則在名爲夷島的位置留下兩處滿文，其中僅有一處可辨識：dergi（東方）。由於二處標示皆位於圖的最邊緣，加上缺乏西、南兩方位的文字註記，可以推知〈北洋海岸圖〉應該是一幅大圖的右上角。這意味著，繪圖者在完成原尺寸大圖時，已將「方位」作爲重要的資訊。換句話說，對於潛在的閱讀者而言，此圖所涵蓋的空間和相對方位並非普遍的常識，而需通過文字符號來特加註明。又由於此圖的左與下兩側山脈和河流均在邊界被截斷，呈現被裁切過的痕跡，可再次證明此圖是從另一幅大圖中裁下。另外，若仔細觀察，會發現圖中有十字摺痕。中央有左右對摺的痕跡，縱向則有四條摺

31 查閱《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蘿圖薈萃》、《國朝宮史續編》等，截至目前爲止，尚不清楚諸書所列目錄中，哪一幅是〈北洋海岸圖〉的原圖，有待未來更多的考證；參見汪前進編選，《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冊 5，頁 1661-1791、1873-1884。

32 蕭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指出清帝國空間概念在乾隆時期發生了本質的改變，展現世界性的觀點，但在 1819 年後又爲中國爲中心的排他主義思想所主導，參見氏著，〈帝國與邊緣：1644 年至 19 世紀清朝與日本及琉球關係比較研究〉，收入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226-245。

痕，大概可以摺疊成長 100 公分、寬 50 公分左右的矩形，顯示此圖原先應是摺疊收藏。不過，目前仍不知將該圖展開裱框的時間，究竟發生在清代或民國以後。[33]綜上所述，原圖應爲一幅約 400 公分左右的方形地圖，涵蓋內陸、東南亞等地。不過，無論原圖面貌如何，〈北洋海岸圖〉現存部分所展示的空間，仍一定程度上反映繪圖者的想法和當時的政治狀況。以下將根據現今僅存原圖右上側部分的內容，探討其中所蘊含的政治意涵。

此圖中的地名是以 1632 年所改革的有圈點滿文依照漢文音譯而成，包括幾項特點。首先，據滿文避諱規範，可大略推知此文本的製作時間。圖中作 yei，而非康熙時期所改的避諱字 ye，例如「兀也吾衛 u yei u wei」、「野木河衛 yei mu hoo wei」、「野兒定河衛 yei el ding hoo wei」、「也孫倫衛 yei sūn lūn wei」、「兀者揆野木千戶所 u je kui yei mu ciyañ hū so」、「也老江 yei loo giyang」、「掖縣 yei hiyañ」、「鉅野縣 jioi yei hiyañ」等；另作 in 或 iñ，而非雍正時期所改的避諱字 yen，例如「法因河衛 fa iñ hoo wei」、「五音千戶所 u iñ ciyañ hū so」、「章尹站 jang iñ dzan」、「背陰障 bei iñ jang」、「江陰 giyang iñ」、「安陰 añ in」、「山陰 san iñ」、「蒙陰縣 meng iñ hiyañ」、「平陰縣 ping iñ hiyan」、「淮陰驛 hūwai iñ i」等。唯有二處書寫成 yen，其一是「老寨 yeñ den」，其二是「古穎巡司 gu yen šūn sy」，前者是整幅圖中唯一非漢文音譯的地名，後者是音譯「穎」字的結果。圖中除了「正安堡 jeng añ pu」和「鄭城驛 jeng ceng i」外，其餘均寫 jen，而非雍正時期的避諱字 jeng。此外，圖中亦從未出現乾隆時期才使用的 lii。綜上諸例，可推測此圖的書寫與繪製時代，介於 1632 到 1661 年之間。[34]

33 雖然因爲史料缺乏，無法詳論，但筆者更傾向於此圖的裁切應發生在清代。首先，因圖中並未有任一處行政區域邊框被裁切過的痕跡；其次，圖左側有許多地名則是用「擠進」有限空間的方式謄寫。最明顯的例子在「陳州」上方「丁家道巡司」，因空白太少無法畫上方框的「西華縣」，其滿文則寫在縣名下方。此兩點似彼此矛盾，前者暗示此圖截自一張更大的底圖，後者卻顯示繪者試圖在既有範圍上將最多元素納入。然此矛盾應是兩個不同製作過程所產生的結果，或因原先底圖在裁切位置上有此地名，但重製過程因空間大小問題，僅能將該名於別處另書。

34 關於滿文避諱規則，可參見盧正恒，〈清代滿文避諱：兼論乾隆朝避諱運用實例〉，《清華學報》，新卷 48 期 3（2018 年 9 月），頁 489-524。

其二，由於當時滿文書寫尚不規範，可猜測成圖時間或在天聰六年新滿文改革前後不久。[35]然繪圖者可能非單一大明漢人，而是來自女眞和朝鮮的多位成員。圖中大量使用 ñ，此書寫方式多出自老滿文，如趙志強所說：「或有或無，似無規律，新滿文中一般不加點。」[36]此外，全圖地名中許多重複字詞，卻並未一致。例如，「河」就有 ho 和 hoo 兩種寫法，「山」也有 san 或 šan。又如「水」理論上應寫作 sui，不過卻有「水城縣 soi ceng hiyan」或「水口驛 soi keo i」。「巡司 šūn sy」也有如「炭者巡司 tañ je sūn sy」、「呂梁巡司 lioi liyang šūn sy」、「車馬巡司 jioi ma šūn sy」等不同拼寫方式。此外，「堡」多數寫作 pu，但也曾出現如「鎮東堡 jeñ dung po」。這些差異往往與新、舊滿文變革有關。如此一來，此圖的書寫時間又可限縮在天聰六年以後、新滿文出現後不久之時，故仍存在老滿文的痕跡與不一致性；甚至地圖的作者可能不止一人，才有如此參差不齊的拼寫現象。

再者，由於滿文皆音譯自漢文，可知漢文地名應先於滿文，漢文當是此圖的「基準」。書寫者對漢字掌握有限，誤讀與誤寫的情形屢見。例如「小團山」標寫爲 san tuwañ sañ，顯然誤讀爲「山團山」；相似的狀況如「矛山」，正確的滿文應爲 ya sañ（牙山）；「灣河驛」的漢文書寫也有誤，滿文反而正確地作 lañ hoo i（灤河驛）；「故害巡司」被寫成 hū hai šūn sy（胡害巡司）、「渾城驛」被寫成 tang ceng i（潭城驛）、「槫野縣」被寫成正確的 bo yei hiyan（博野縣），「傳興縣」也被寫成正確的 bo sing hiyañ（博興縣）等。還有另外一種狀況，例如「仙靈寺」被寫成 siyañ ling pu，「密陽」被標示爲 ni yang，「昌黎縣」則寫成 cang i hiyan，其第二字理皆應爲 li。又，「城」字滿文爲 ceng，但不少處卻被書寫成 cing，如「聊城縣 lio cing hiyan」、「昨城縣 dzo cing hiyan」、「朝城縣 coo cing hiyan」、「虞城縣 i cang hiyan」等例。又

35 現今多數研究均指稱有圈點滿文創製於天聰六年，但仍有不同說法，如關孝廉的天聰三年說與關克笑約在天命八到十一年說。參見韓曉梅，〈從軍機處滿文寄信檔看乾隆帝規範清文的使用〉，《滿族研究》，2003 年第 3 期，頁 64、張虹，〈老滿文改革的初始時間〉，《滿語研究》，2006 年第 2 期，頁 28-31。

36 趙志強，〈老滿文研究〉，《滿語研究》，2003 年第 2 期，頁 35。

如「港」字，既未標寫爲 gang，反而更類似「巷」，如「石港巡司 si siyan šūn sy」、「張港巡司 jang šang šūñ sy」、「利港巡司 li siyang šūn sy」、「安港巡司 añ siyang šūñ sy」等寫法。質言之，滿文在音譯漢文地名時的不統一性、誤讀及不熟悉等現象，暗示書寫者雖以漢文爲基準進行翻譯，但因對漢字或地名不熟悉而出現錯誤，由此可推測書寫者或非漢人。

雖說圖中多數標示採滿文音譯，但仍有四處採取意譯並註記滿文，除了前文提及的「老寨 yeñ den」外，另外三處分別如下：其一，在「金城 jiñ ceng」旁書 aisin han i hecen，即「金汗之城」；在「長白山 cang be sañ」旁寫有 šanggiyan alin，即「白山」；在朝鮮的「京都 jing du」旁寫下 solho wang ni hecen，即「首爾王之城」。其中，「金汗之城」當指金國大汗所居之城；只是，究竟是指哪一座城市呢？努爾哈赤（1559-1626）曾於萬曆十五年（1587）以費阿拉爲中心，天命元年（1616）以赫圖阿拉爲都、六年（1621）以遼陽爲都，十年（1625）遷都瀋陽。[37]由於 aisin han i hecen 是一補充說明式的標記，有其清晰時間指標性，顯示地圖呈現的是天命六年前的狀態，即便因圖面空間繪製的失眞，難以確認是費阿拉或赫圖阿拉，不過顯然以後者的可能性更大。又，圖中有稱天啓元年（1621）——即天命六年——後毛文龍所屯聚的主要據點爲「皮島」，而非舊名或朝鮮常用的「椵島」，可知〈北洋海岸圖〉的知識內容呈現 1621 年左右的狀況。此外，天聰八年四月，皇太極改瀋陽爲盛京、赫圖阿拉稱興京，並令：「嗣後，凡人勿稱漢人舊名，俱照以我國語新定者稱之。若不用國語名稱，仍稱漢名者，乃係不遵國法，恣行悖亂者也！」[38]圖中用「瀋陽衛 sin. yang wei」而非「盛京 mukden」，也未在瀋陽附近見到如 aisin han i hecen 這類描述性質的額外補充。以滿文書寫，自當會被熟讀滿文者瀏覽，甚至可能

37 《清實錄．滿洲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7，頁 330-331；卷 8，頁 376-378，下引簡稱《滿洲實錄》；劉小萌，《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97、161。另，本文明、清實錄及朝鮮君主之日記、實錄，均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建置之漢籍全文資料庫，下不贅敘。

3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上冊，頁 75。

是接近金國朝廷中樞者，那麼這些滿文書寫就必須遵循國法規則，因此可知此圖至少完成於 1634 年前，但呈現的資訊以 1621 年爲主。

又，地圖標示三條紅色路線，一條是從朝鮮京都通往北京京師，即朝鮮朝貢的朝天路線。相較於過去對於朝天路線的理解，〈北洋海岸圖〉的路線更加細緻，並在山海關以後的路線與過往學界所述有些許差異。[39]另外二條紅線：其一由寬奠通往鎭夷堡。寬奠於萬曆四年（1576）被展拓，並且將設於鳳凰城的定遼右衛之參將等遷移到寬奠，同年開市永奠堡，允許寬奠可向「東夷」貿易。[40]其二則是撫順關到遼陽都司。天順八年（1464）四月，明廷命遼東總兵等官員，未來若遇有建州等衛女眞「到邊」，則令從撫順關口進入，於撫順城交易。[41]此規範持續延續，最終形成定例。[42]此二條路線爲明代女眞人朝貢、交易所利用的路線，例如努爾哈赤年少時即通過撫順關與明朝貿易營生。[43]由於過去明朝地圖一般不將朝鮮境內的朝天路線畫出，〈北洋海岸圖〉展現這些路程，在繪製上至少與朝鮮知識有強烈關連；但又標示了女眞人朝貢貿易的交

39 傳統上陸路的朝天路線沿途經過：九連城、湯站、鳳凰城、鎭東堡、通遠堡、連山觀、甜水站、遼東都司、鞍山驛、海州衛、牛家庄、西平堡、鎭武堡、盤山驛、廣寧鎭、閭陽驛、十三山驛、大凌河、杏山驛、曹家庄驛、東關驛、沙河驛、高嶺、山海關、遷安驛、榆關驛、蘆峰口、灤河驛、義豐驛、陽樊驛、漁陽驛、三河驛、夏店驛、玉河館等。參見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頁 27-28。

40 〔明〕李東陽纂，〔明〕申時行重修，《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卷 129，頁 1843-1844。

41 《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影印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卷 4，頁 102。

42 《明憲宗實錄》，卷 38，頁 752。

43 參見劉小萌，《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頁 99-100。另一幅被認爲是 1644 年以前、清方所繪的〈北方邊口圖〉，也曾繪製了朝貢道里路線，其中三條路線均在〈北洋海岸圖〉中出現。此圖涵蓋完整的明代九邊，直到嘉峪關處，不過更強調山西以東的區域。有數條用紅線繪製的路線圖：一條從鎭北堡起，途經開化城、中固城、鐵嶺城、汎河堡、懿路縣、蒲河堡、瀋陽城、虎皮驛堡、遼陽城、鞍山驛，海州城。海州城同時也是從南方旅順口南城往北，經過金州、苑馬寺、復州、蓋州、耀州的終點；另一條以海州爲終點的路線，則是從寬奠堡經過清河堡、岫崖堡通往海州。另有一條起於朝鮮，經過火奠堡、寬奠堡、新奠堡、靉陽城，通向遼陽城的路線。還有一條起於瀋陽城、經過撫順新城、通往奉集堡，終於遼陽城的路線。從海州通往東昌堡、西寧堡、西平堡、鎭武堡、盤山驛城、廣寧鎭城、開陽驛城、十三站城、大凌河城、小凌河城、松山所城、杏山驛城、左中所城、連山驛城、寧遠城、曹庄驛城、中右所城、東園驛城、中後所城、沙河驛城、前屯衛城、高嶺驛城、中前所城、八里舖、羅城、山海關路，此後一路通往關內諸地等。詳閱〈北方邊口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平圖 020857。

易處所，說明此圖關注和強調 1620 年代前的東北地區狀況，並且著重呈現了女眞與朝鮮兩方的認知。

據上所考，大致可以斷定此圖是一幅更大地圖之右上部分。圖中絕大部分的地名均是依照明代地名進行直接的音譯；如 Lisa Hellman 指出，地圖在二種語言間地名、山川、河流轉寫，不是單純文本翻譯，也蘊含政治意涵，隨著需求改變、調適的過程，體現多層次面貌。[44]一如西方其他帝國在建立新空間秩序時，會以羅馬拼音進行標準化地名標示，通過實際和想像的方式建構新控制區域的知識體系。[45]對大清而言，此模式並不罕見，例如在 1664 年的〈臺灣略圖〉亦可見到類似狀況。[46]簡言之，依據繪製的地名和少數的補充文字，可以推測此圖之底圖約完成於 1621 年前後，但是全圖繪製完成應在 1632 到 1634 年之間，且由女眞人和熟悉朝鮮（或即朝鮮人）共同完成。

四、從山陰到漢城到盛京：〈天下輿地圖〉的流傳

孫靖國與陳宗仁等學者都強調，應通盤考量地圖信息之複雜性和層累性，後者即以 Mr. Selden’s Map 爲例，分析了多元知識疊加於同一地圖之現象，指出該地圖呈現出新舊知識交織於圖上不同區位的模式。[47]〈北洋海岸圖〉亦復如是。根據前述可知，此圖部分資訊停留在 1621 年左右，但滿文書寫卻是在

44 Lisa Hellman, “Drawing the Lines: Translation and Diplomacy in the Central Asian Borderland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82:3 (2021), pp. 492-493, 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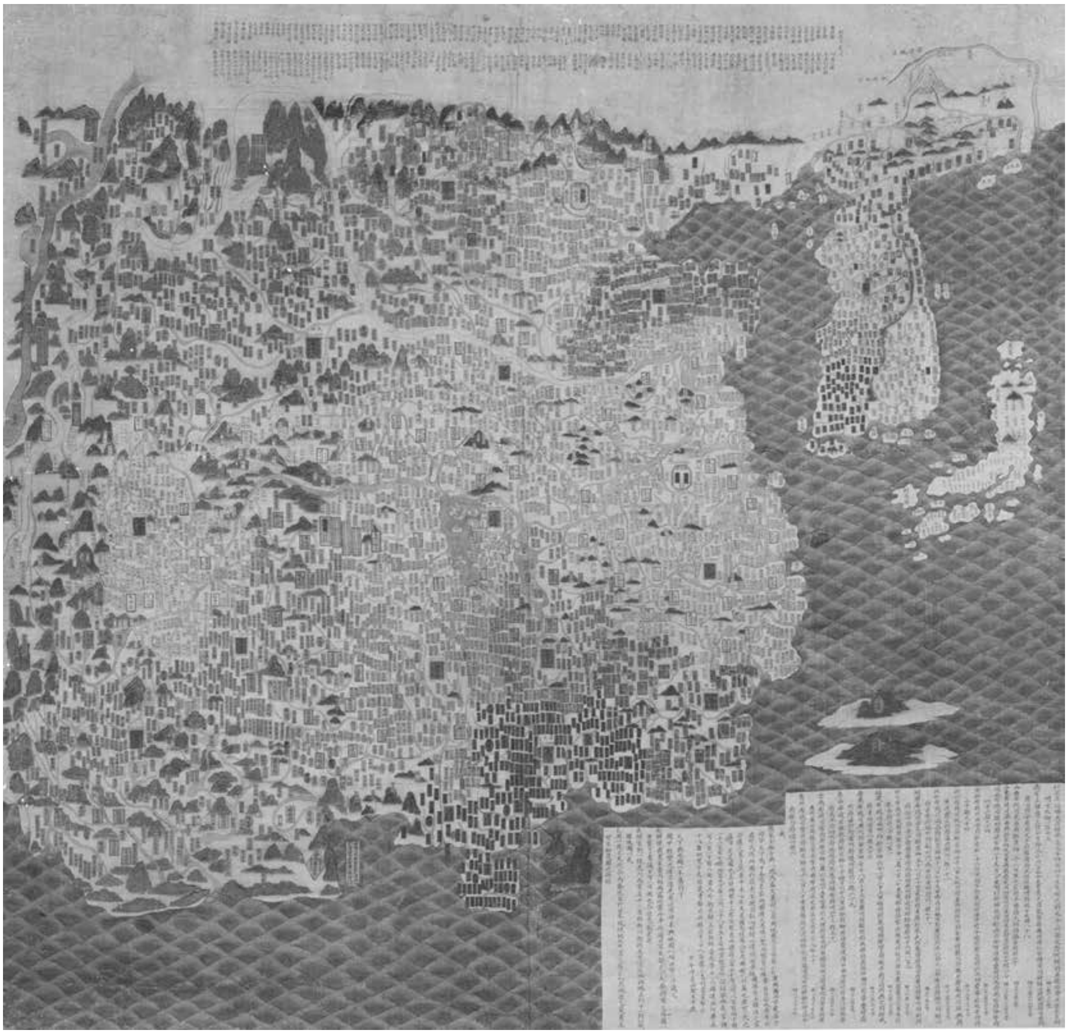
45 Michael S. Reidy, “From the Oceans to the Mountains: Spatial Science in an Age of Empire,” in Jeremy Vetter, ed., *Knowing Global Environments: 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Field Scienc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7-18.

46 盧正恒，〈賊諜四出廣招徠：鄭氏諜報網、清帝國初期的東南海島認識與《臺灣略圖》〉，《臺灣史研究》，卷 26 期 1，頁 1-58。

47 孫靖國，〈《江防海防圖》再釋──兼論中國傳統輿圖所承載地理信息的複雜性〉，《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6 期，頁 21-31；陳宗仁，〈Mr. Selden’s Map 有關日本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收入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8），頁 359-365；陳宗仁，〈Selden Map 有關臺灣與琉球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兼論北港與加里林的位置與地緣意涵〉，《臺灣史研究》，卷 27 期 3（2020 年 9 月），頁 1-42。

1632 到 1634 年間完成。由於〈北洋海岸圖〉應據原始圖資重新製作而成，其中又充滿關於朝鮮的知識：那此原圖為何而畫，又由何人所畫？本節將指出，〈北洋海岸圖〉是基於 1620 年代朝鮮重繪自 1594 年山陰人白君可繪製、王泮（1535-?）題跋之〈天下輿地圖〉的衍生版本。

圖2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天下輿地圖〉



資料來源：〈天下輿地圖〉，法國國家圖書館藏，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2504834s/f1.item.zoom（2022 年 12 月 20 日檢索）。

現今流傳較廣的〈天下輿地圖〉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圖 2），[48]根據《地輿縱覽》介紹：此圖爲絹本彩繪，尺寸爲 195 公分寬、185 公分高，較〈北洋海岸圖〉小，謝國興與陳宗仁認爲是朝鮮人士在白君可原圖基礎上再繪製，增添了朝鮮、日本、琉球與「女眞」地區，並著重描繪山脈、河湖、長城、「海洋」。[49]雖然陸傳傑稱此圖爲 1626 年由朝鮮重繪，但是未說明其考證依據。[50]學界對此圖已有詳盡探討，本文將重新審視現知此圖的各種版本，逐一解構其繪製過程，討論重製的〈北洋海岸圖〉應於何種脈絡中加以理解。以下將以任金城、孫果清、楊雨蕾三人的研究爲基礎，重新給予諸版本代稱進行釐清。

學者指出，山陰人白君可在萬曆十四年（1586）到萬曆二十二年（1594）間得到原圖（楊雨蕾稱爲輿地圖甲，本文延續之）；萬曆二十二年刻板印製，並由王泮題跋（楊雨蕾稱爲輿地圖乙，本文延續之）。又，據〈天下輿地圖〉的「跋」所述，壬辰戰爭（1592-1598）前，此圖已流傳於朝鮮，然而戰爭後地圖佚失，在「某一年」又自明朝「近得」地圖印本，從而「更考《大明官制》、《一統志》，則兩京及十三省，府縣州衛所互有增減，以此略正」。不過現在並不清楚這段期間有多少版本問世，但重製版本有所增減，明顯界於前、後版本間；爲了分析方便，本文稱爲輿地圖丙（大約畫於 1598 年之後）。再者，任、孫二人依照「中國」州縣驛站考證，指出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之〈天下輿地圖〉約在萬曆三十一年（1603）到天啓六年（1626）完成（楊雨蕾稱爲輿地圖丙，但本文稱爲輿地圖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任、孫二人的考證結論是基於「中國部分」，楊雨蕾則納入朝鮮半島的考證。楊氏比較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天下輿地圖〉及另一藏於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的版本後，根據朝鮮藏圖可見 1637 年設置的「慈仁縣」和 1652 年廢除的「牛峯縣」，斷定法國藏〈天

48 多數學者將該館此藏圖定名爲〈王泮題識輿地圖摹繪增補本〉，但根據其跋文，此圖原名爲〈天下輿地圖〉。參見劉曉生、王超傑，〈明季肇慶知府王泮手跡考〉，《文化雜誌》，期 99（2016 年），頁 102。

49 謝國興、陳宗仁主編，《地輿縱覽：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中文古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8），頁 13-14。

50 陸傳傑，《被誤解的臺灣古地圖》（臺北：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 62。

下輿地圖〉應繪於 1637 至 1652 年間。最後，楊氏通過用字、繪製等特色，認爲首爾歷史博物館藏圖是基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天下輿地圖〉所繪的非官方修正版，至於繪製時間則有待後續考證，本文稱爲輿地圖戊。[51]楊雨蕾比較二幅圖後，認爲整體而言，朝鮮、日本相似度高，中國部分差異較多，因而二者並非出自同一摹繪本。此圖反映出在不同時期繪製過程中所增添的各類知識，以及其延續的過程與痕跡。

由上述分析可見，學者基於不同地區進行時代考證：楊雨蕾基於朝鮮狀況，考證地圖繪於 1637 到 1652 年間；孫果清等則依照「中國」部分，考證爲 1603 到 1626 年間繪製。結合前述謝國興與陳宗仁所言，考量到輿地圖甲和乙均僅有「中國」部分，目前所見的輿地圖丁中，朝鮮等地名當爲 1620 年代朝鮮第二次獲得此圖後才添加。[52]事實上，若要理解〈天下輿地圖〉，必須將朝鮮等區域和中國區隔審視，視其爲不同時期繪製知識層累之結果。由於朝鮮部分是後來所添加的，現在所見的輿地圖丁之中國部分，與輿地圖丙相同，即是繪製於 1603 到 1626 年之間。也就是說，目前得以見到的輿圖丁爲 1637 到 1652 年間所繪製，不過，並不能因此認爲輿圖丁即是「近得」之版本。根據中國的狀況，至少能知道此圖中國部分展現的是 1620 年代的現象，而〈北洋海岸圖〉的內容則大概在 1621 年左右，符合輿地圖丙的繪製時間。與現今所見的法國國家圖書館或首爾歷史博物館版本相比，可以發現〈北洋海岸圖〉在東北地區極爲詳實細緻，即相較於更晚成圖的輿地圖丁和戊，此圖更加強調東北空間。即使地名並未被輿地圖丁、戊所承襲，但彼此間仍有資料和地理知識上的傳抄

51　梁二平，《中國海圖史（前 310-1931）》（香港：開明書店，2021），頁 218；孫果清，〈罕見的大幅彩繪全國地圖──王泮題識《輿地圖》鑒賞〉，《地圖》，2009 年第 1 期，頁 134-135；任金城、孫果清，〈關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發現的一張十六世紀的中國地圖〉，《文獻》，1986 年第 1 期，頁 145-162。然而，〈北洋海岸圖〉中並沒有「慈仁縣」，亦呼應本文前述該圖製作 1637 年以前。楊雨蕾，〈關於「王泮題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的韓國藏本〉，《文獻》，2012 年第 4 期，頁 138-139。此外，楊普景分析朝鮮本，認爲該圖原先版本與王泮、利瑪竇有關，後來才由朝鮮繪製成〈朝鮮本天下輿地圖〉，並稱該圖具有十六世紀地圖的特點和狀況。然楊氏誤認此圖爲王泮所繪製；詳細考證過程，可參見楊普景，〈17 世紀朝鮮本天下輿地圖의考察〉，收入藤井讓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主編，《絵図・地図からみた世界像》（京都：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2004），頁 180-189。

52　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前述任一版本地圖，均未列出天啓元年登萊巡撫與相關駐地。

關係。二圖外觀輪廓高度相似，雖然在地名數量和比例上以及朝天路線的有無等方面，均有所差異，但有一些部分，仍都被以相同的方式繪製，例如東北、朝鮮的山脈走向相同、山海關入海的樣貌、旁邊的望海亭僅存其名、望夫臺有一處樓臺等此外，二圖的海岸線、港灣數量雷同，地名符號的圖示亦然。故而，根據外觀、符號使用、山脈走向、海岸線與海灣數量等，二圖從符號到外觀的使用都高度重複。以下將以法國圖書館藏〈天下輿地圖〉爲基礎，嘗試論述〈北洋海岸圖〉參考的資料出自輿地圖乙到丁間的版本，或是輿地圖丙，分析其中存在的不同時期知識，進而與〈北洋海岸圖〉相互比較。

比較發現，二圖在地名數量上存在差異，但最顯著的不同在於東北地區。〈北洋海岸圖〉東北地區有 173 處地名，但〈天下輿地圖〉中僅有 57 處地名。若〈北洋海岸圖〉的繪製時間在前，〈天下輿地圖〉在後，那〈天下輿地圖〉上關於東北的資訊，是否來自〈北洋海岸圖〉呢？關於輿地圖丁，過去多聚焦在朝鮮、中國、琉球、日本等，對東北、渤海關心較少。輿地圖丁版本的〈天下輿地圖〉標有混同江，而其下游部分則爲黑龍江。實則，在光海君十一年（1618），朝鮮備邊司即稱：「所謂烏龍江，未知的指何處，而我國之曾所未聞者也。」並且在探詢、考察「天下地圖」後發現：「我國咸鏡道越邊有黑龍江，而此江亦不知果在何處。」[53]大部分明代、朝鮮地圖並不會將遙遠的黑龍江畫出，因此這幅當時朝鮮王廷所考察、畫上黑龍江的「天下地圖」，究竟是哪一幅圖，值得深究。更重要的是，這一段文字反映了當時朝鮮已掌握描繪東北空間的圖資。輿地圖丁和〈北洋海岸圖〉都出現朝鮮專用之名詞，例如將葉赫部稱爲「如許地方」、[54]另外還有「老土部落」、[55]「件乙加退」。[56]然而，

53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下略），《光海君日記》，收入《朝鮮王朝實錄》（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東國文化社，1955-1958，影印國編本），卷 144，頁 19。

54 朝鮮宣祖二十九年（1596）有如下的描述：「奴酋，自其家，南距大吉號里一日程，北距如許，向路一日程，各設一堡；西距遼東，向路一日程，設十堡。」又，宣祖三十八年（1605），稱：「於癸未年間，始聞鍾城有忽賊之變，自是入寇，殆無寧歲。僉使欲知忽溫、如許、建州衛三酋，連和與否，訪問於胡人，頗得其詳。」參見《朝鮮宣祖實錄》，卷 71，頁 45；卷 189，頁 14。

55 例如宣祖三十二年（1599）在談論與金國作戰時特別探討老土部落與其他部落的相對位置之所在。《朝鮮宣祖實錄》，卷 120，頁 12。

56 爲當時朝鮮稱呼大明東北地區的地名之一，如朝鮮世祖二年（1456）、朝鮮宣祖三十七年（1604）都有描述該處的狀況。《朝鮮世祖實錄》，卷 3，頁 7；《朝鮮宣祖實錄》，卷 177，頁 6。

〈北洋海岸圖〉同時體現 1620 年代中國地名稱呼的痕跡，例如直到崇德年間，朝鮮所寫的《瀋館錄》中，仍將「皮島」稱爲「椵島」，但前者已出現在〈北洋海岸圖〉中，而後者則出現在〈天下輿地圖〉丁和戊中。[57]此外，〈北洋海岸圖〉將長白山地區標示爲三座山：白頭山、豆里山、長白山，[58]其中「豆里山」是屬於朝鮮對長白山脈認知的一環；但是，〈天下輿地圖〉中並未標示此山。[59]職是之故，〈北洋海岸圖〉並陳了皮島（椵島）、豆里山等地名，顯示其兼納了屬於中國與朝鮮的地理知識。較合理的解釋是：輿地圖丁與其前身輿地圖丙在東北地區類似，而〈北洋海岸圖〉在製作時，或參考輿地圖丙的資料，並補充新的圖資。換言之，對於明朝與朝鮮均不甚熟悉的東北地區，朝鮮王廷曾試圖掌握地理實況，而〈北洋海岸圖〉即可能是其獨立製作，但與輿地圖丁之間並無傳承關係。此圖中出現了朝鮮對於東北地名專用詞彙的使用和描寫，亦有相較於現知〈天下輿地圖〉各版本更爲細緻的添補，也充分體現繪圖者與潛在閱讀者對於瞭解此一區域的需求。

雖然〈北洋海岸圖〉與目前所能見的〈天下輿地圖〉輿地圖丁之間的關係不詳，但是〈北洋海岸圖〉中仍有源自朝鮮龐大的地理知識。十七世紀前二十年——如孫果清等人依照中國部分定位的繪圖時間——朝鮮有大量製圖的需

57 《瀋館錄》爲朝鮮世子被質於瀋陽之紀事，當中也用「椵島」稱之；參見〔清〕佚名，《瀋館錄》，收入金毓黻主編，《遼海叢書》（瀋陽：遼瀋書社，1985），冊 4，卷 1，頁 2769。

58 〈北洋海岸圖〉以漢文音譯的 cang be sañ 和滿文 šanggiyan alin（白山）標示之。šanggiyan alin 是《滿文老檔》中稱呼該山的方式，參見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東京：東洋文庫，1955-1963），太祖第 1 冊，頁 228、233、300；太祖第 2 冊，頁 601、875；太宗第 1 冊，頁 114、133。有趣的是，在《滿文老檔》中，描述「五國城」位於長白山 šanggiyan alin 的日出方位 šun dekdere ergide 或是 šanggiyan alin i dergi u guwe ceng ni hecen，但與地圖中的方位並不相同。參見《滿文老檔》，太祖第 1 冊，頁 233、300；太祖第 2 冊，頁 601。如 Seonmin Kim 所述，對清代統治者而言，長白山屬於滿洲地域；但朝鮮並不認爲它隸屬滿洲，而白頭山是此山脈的最高點，並被視爲朝鮮發源地。雙方經過調查與合作後，才在 1711 年左右達成一種地域疆界上的共識。參見 Seonmin Kim, "Ginseng and Border Trespassing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Late Imperial China*, 28:1 (June 2007), pp. 43-46.

59 例如朝鮮世祖十三年（1467）時，就提到節度使康孝文曾詢問曾在海邊後遷移到豆里山的骨看兀狄哈部落的李都弄吾等，關於他們是否知曉有船隻停泊厚羅土島之事情。《朝鮮世祖實錄》，卷 42，頁 9。骨看兀狄哈部落與鄰近海洋，其中一位酋長豆稱介原活動於「塞北海濱」，並於朝鮮太宗十年（1410）左右由朝鮮王廷招撫之，參見《朝鮮太宗實錄》，卷 19，頁 50。

求，除了朝鮮的李睟光（1563-1628）在 1614 年《芝峰類說》記載了他在萬曆三十一年接觸利瑪竇地圖，並讚許其精細程度。[60]努爾哈赤勢力興起後，明軍要求朝鮮協助剿滅之，光海君十年（1617），明朝遼東經略楊鎬（？-1629）與朝鮮約定一同進軍，防備「可能」東竄的努爾哈赤，並在冬季時配合進擊；楊鎬要求朝鮮將兵力、將領安排於何處要衝後，「圖畫近酋地理形勢」，交由當時負責聯繫的李埈攜往明營。[61]隨後，楊鎬又遣于承恩前往碧潼、昌州等處，審察「道里」並「圖畫形勢」。[62]不久後，朝鮮義州府尹上呈「圖形」：「則虜穴與理山、碧潼、昌州等處甚近，此等邊圉，尤加嚴密防備。而江界、寧邊等地，使何人堅守乎？各別議處。」[63]可知因楊鎬的軍事規劃，光海君十年朝鮮開始一系列對於邊關地圖的繪製。該年六月十九日，朝鮮已完成軍隊布署與圖繪，並將「近酋地理形勢」另外製圖交予明軍。[64]因此，雖然無法果斷推測輿地圖丙繪製是否眞在此種情況下重製，但 1610 到 1620 年代，確實是朝鮮對於女眞所在的東北地區，其地圖需求與地理調查最爲活躍的高峰期。

過去討論〈天下輿地圖〉，都聚焦在替此圖題跋的王泮，尤因其任肇慶知府期間曾接觸過利瑪竇（Ricci Matteo, 1552-1610）等傳教士，協助製作第一幅以西方技術繪製的中國地圖。[65]利瑪竇抵華後，在寓所中懸掛一幅以外文標註的世界地圖，爲了傳教，他以添加入基督教元素的歐洲地圖爲藍本，繪製出較大的圖。1583 年利瑪竇與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甫至肇慶，就已與王泮往來，並藉由展示西方物品圖繪博取官員和民眾關注；王泮也曾將一幅聖母小像寄回山陰，呈予其父。[66]萬曆十二年（1584），在王泮的要求

60 參見安洙英，〈朝鮮後期西方地圖的傳入與影響〉，《世界歷史評論》，2021 年第 4 期，頁 151-169、轉頁 293-294。

61 《光海君日記》，卷 129，頁 99-101。

62 《光海君日記》，卷 129，頁 152。

63 《光海君日記》，卷 129，頁 165-166。

64 《光海君日記》，卷 130，頁 192-197。

65 關於王泮與傳教士之間的關係，可參見陳慧宏，〈利瑪竇研究的過往及思考：兼論幾本新著及利瑪竇史料〉，《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卷 10 期 1（2013 年 6 月），頁 261-297。

66 陳慧宏，〈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時代的視覺物像及傳播網絡〉，《新史學》，卷 21 期 3（2010 年 9 月），頁 64-65、74。

下，利瑪竇繪製經過修正的中文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圖〉，作爲禮品贈予文人或官員。[67]王泮因而具有將新式地圖在文人圈中「分享」或作爲「禮品」傳遞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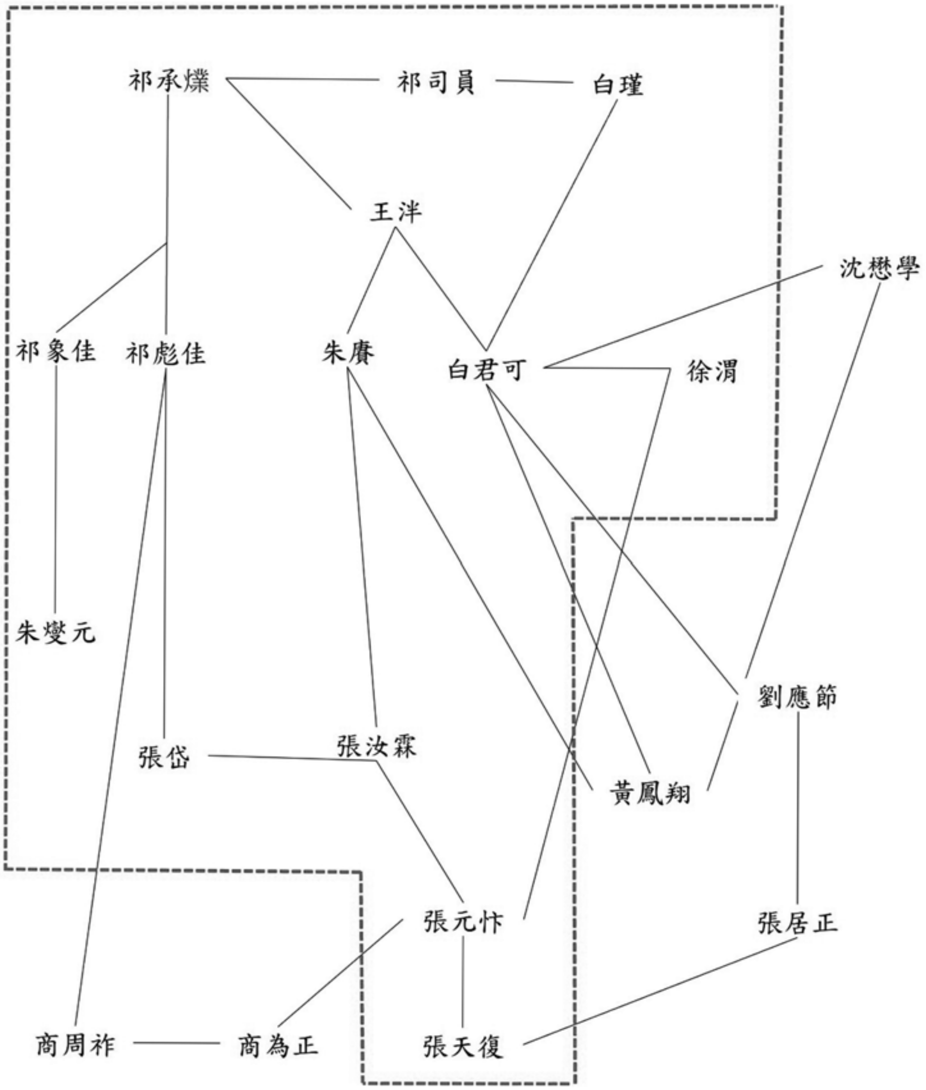
然則，更該花費心思討論的，其實是獲得地圖並將其刻板印製的白君可。白君可與王泮爲山陰同鄉，生於家境殷實的官宦家族。其曾祖父爲成化十四年（1478）進士白瑾（？-？），並曾任分宜縣令，且有恩於後來的首輔嚴嵩家族。[68]雖然白家在明代並未有其他具有科舉功名者，但白君可好客，在當時文人圈中有著「孟嘗」、「俠」等雅號。其交友甚廣，有無功名的文人雅士，如山陰名士徐渭（1521-1593）等；亦有位高權重的大臣，例如順德人歐大任（1516-1595）、泉州名士黃鳳翔（1538-1614）、萬曆五年（1577）狀元宣城人沈懋學（1539-1582）、當時刑部尙書劉應節（1517-1590）等。[69]雖然資料零星，但根據上述資料可以得知：白君可先祖已任官、曾祖以增廣生的名義求學，他本人不僅出版詩冊，更結交各地名士和朝中重臣、樂於助人而有「孟嘗」之雅號，可以推想，沒有功名的白君可欲藉由積極交遊，以謀取更多的名聲與機會。

67 陳慧宏，〈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時代的視覺物像及傳播網絡〉，《新史學》，卷 21 期 3，頁 68-69；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4-5。

68 〔明〕徐渭，《徐文長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明刻本），冊 1355，卷 26，頁 3-5。根據白瑾的進士登科錄，他字瑩之，身分是山陰縣學的增廣生，考中進士時三十歲，且其曾祖白國光已擔任知州一職，參見《明成化十年甲午科浙江鄉試錄》（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譜牒庫》，2022 年 8 月 5 日檢索），卷 1，頁 21；《明成化十四年戊戌科進士登科錄》（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譜牒庫》，2022 年 8 月 5 日檢索），卷 1，頁 76。

69 〔明〕徐渭，《徐文長逸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明天啓三年（1623）張維城刻本），冊 1355，卷 4，頁 24；〔明〕黃鳳翔，《田亭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1612）刻本），卷 4，頁 27-28。黃鳳翔曾經二次乞休，初次是萬曆十八年（1590）三月時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時，乞休獲准；不過，隨後又起用，直到萬曆二十三年（1595）九月陞任爲南京禮部尙書後，以母老爲由辭返，在籍候用。參見《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230，頁 4266；卷 289，頁 5351。上述群體與海外、傳教士關係均密切，如徐渭爲胡宗憲的幕僚，黃鳳翔家族長年參與海上活動。劉應節死於萬曆十八年 6 月，參見《明神宗實錄》，卷 234，頁 4335-4336。

圖3　白君可與王洋人際網絡圖



資料來源及說明：筆者自行整理。虛線框以內者表示爲山陰人。

根據圖 3 與前面的討論，可以引出一項問題：當白君可獲得輿圖時，依其人際網絡，應有更多具名望之士或是朝中重臣可協助題跋——不說他人，劉應

節、黃鳳翔等與其關係密切者就是潛在人選，但白氏爲何選擇在萬曆八年到十二年間（1580-1584）任肇慶知府的王泮？[70]難道僅因王泮曾在獲得此圖之所在地任官？據王泮於萬曆二十二年所撰題跋的前半段文字：

> 我國全撫方輿，一統為盛。文襄桂公有《輿地圖志》，念菴羅公有《廣輿圖》，而皆載在方冊。分天下為十五道，未若此圖廣大悉備，一覽而幅員形勝，舉在目前也。吾友白君可氏得此圖於嶺表，不敢自私而鋟梓以傳。經世者披圖按索，而疆理之宜，修攘之策，了然胸中，未必不為是圖為桂、羅二公志輿圖之羽翼也。君可氏之惠溥矣。[71]

雖然現今學界認同羅洪先《廣輿圖》具有開創性的時代意義，如成一農指出《廣輿圖》在明代出現多種版本，廣泛被引用與改繪，稱：「中國古代未曾有任何一幅（套）地圖有著這麼廣泛的流行度和影響力。」成氏認爲在計里畫方、地圖符號、表格呈現政區沿革、名臣議論等幾個特點，均促使《廣輿圖》流行；但此圖在當時雖然廣泛流行，其經典地位卻是後代建立的。[72]結合此例與王泮的題跋文字，可發現他將白君可刊刻之輿地圖甲置於桂萼、羅洪先脈絡下，並宣稱在地理範圍上更加寬廣，暗示了擴大知識之意。此段文字與另一山陰人張天復（1513-1578）撰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皇輿考》〈序〉脈絡雷同：「頃年輔臣文襄桂公《輿地圖志》、宮諭念菴羅公《廣輿圖》及司馬許公《九邊論》，於是三者獨詳，詞約而事該，憂深而思遠。」[73]即是對於王泮、張天復等人而言，他們試著建立桂萼、羅洪先、張天復、白君可之間承襲的地圖知識脈絡。

---

70 參見〔明〕陸鏊、〔明〕陳烜奎纂修，崇禎《肇慶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影印明崇禎十三年[1640]刻本），冊 16，卷 5，頁 4。雖然尚未有學者討論明代山陰地區地圖學者與地理知識之間的傳承關係，但已有學者關注清代紹興地區藏書家的人脈網絡，指出人脈網絡是藏書家間交流擴大社群的關鍵。參見陳柏溢、陳冠至，〈清代紹興府藏書家之社會網絡分析〉，《圖資與檔案學刊》，卷 13 期 1（2021 年 6 月），頁 83-131。

71 法國藏之圖「惠溥」二字模糊不清、難以辨識，感謝匿名審查人依照首爾歷史博物館藏本加以糾正。

72 成一農，〈經典的塑造與歷史的書寫──以《廣輿圖》爲例〉，《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4 期，頁 174-183。

73 〔明〕張天復，《皇輿考》（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1588]張象賢遐壽堂刻本），序頁 1。

張天復家族與王泮同是山陰人，且相互友好、關係密切。又，王泮的世交祁承㸁（1563-1628）也是山陰人，且爲明代最重要藏書家之一。[74]考量到此圖是白君可於嶺南獲得後重新刻板印製，朝鮮曾在壬辰戰爭前後至少二度獲得圖像。可以推測，白君可重製此圖，也是希望將其充作禮品贈送。從這一點而言，以王泮這位熟悉地圖，加上在山陰地區擁有龐大人脈（包括藏書家族祁家、仕紳朱家、輿圖製作的張家等人），他還有將利瑪竇地圖做爲禮物分送贈與的經驗，或許在這些理由下，王泮因而成爲撰寫題跋的合適人選。[75]

過往研究往往忽視〈北洋海岸圖〉整體地理知識轉換、增添的過程。白君可刊版印制的版本，或許最初是以山陰文人爲核心流傳分享的圖繪，但因緣際會下被朝鮮取走，並且多次重新繪製於絹布上並增加新資訊，形成目前所見的多版本、多資訊並陳的狀態。在該圖東北地區，包括豆里山和東北女真諸部落的名稱，都不是明朝所關注、所理解的地理知識，而是在重製成輿地圖丁時所添加。考量到當時努爾哈赤興起、楊鎬要求朝鮮調查女真區域的地理狀況，這些添加正巧反映在〈天下輿地圖〉上。因此，此圖亦從原先的八幅圖變成繪於絹布上的大幅輿圖，其性質也從山陰文人間交流、分享、收藏的物品，轉變成朝鮮王國據其對於東亞世界的認識而重製之地圖。最後，相關實物和知識則從朝鮮進入金國，最終被繪製成〈北洋海岸圖〉之原圖。

74 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所編的《澹生堂藏書目》中，也蒐藏有張天復《皇輿考》在內的各種地圖、圖說（例如《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等）。《澹生堂藏書目》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成書。參見〔明〕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宋氏漫堂抄本），冊 919，史部上，頁 24-30。

75 這些人群和其後學與王陽明（1472-1529），其學說均關係密切，並且也都是當時接觸利瑪竇等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知識，包括地圖在內的首批人物。1596 年「陽明後學」代表人物章潢（1527-1608）開始才建立更加密切的友誼，此後改變了利瑪竇和當時學界高級高員交流之始，如章潢臨摹利瑪竇《輿地山海全圖》並收入其編輯的《圖書編》，又如焦竑（1540-1620）提拔徐光啓（1562-1633）於落卷之中；桂萼（1478-1531）曾推薦王守仁打擊政敵鞏固自己的地位。王守仁學說主要繼承者之一鄒守益（1491-1562），其孫鄒德涵（1538-1581）、鄒德溥（1549-1619）也受到羅汝芳（1515-1588）、耿定向（1524-1596）等人指點。羅洪先（1504-1564）來自吉水，是主要推廣陽明講學者，並與陽明學弟子友善，受其影響的學生甚多。朱燮元（1566-1638）與其家族也深受陽明學之影響。參見黃文樹，〈陽明後學與利瑪竇的交往及其涵義〉，《漢學研究》，卷 27 期 3（2009 年 9 月），頁 127-158；鄧國亮，〈田州事非我本心── 王守仁的廣西之役〉，《清華學報》，新卷 40 期 2（2010 年 6 月），頁 265-293；呂妙芬，〈明代吉安府的陽明講會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5（2001 年 6 月），頁 197-268；游槃文，〈朱燮元的家世與早期官宦經驗（1566-1620）〉，《史匯》，期 19（2016 年 6 月），頁 153-178。

表1　〈北洋海岸圖〉與法國、朝鮮藏本〈天下輿地圖〉之島嶼標記比較[76]

島名	〈北洋海岸圖〉		〈天下輿地圖〉		〈朝鮮本天下輿地圖〉		1621年海上朝天路
渤海島嶼							
覺華島	O	jiyo howa doo	X		X		—
三山島	O	sañ san doo；鄰近山東濰縣	X		O		—
麻洋島	O	ma yang doo	X		X		—
駝基島	O	to ji doo	X		O	作駝機	—
廟島	O	mioo doo	X		O		O
珎朱門	O	jeñ ju men	X		X		—
雙島	O	suwang doo	X		X		—
長行島	O	cang sing doo	X		X		—
黃城島	O	hūwang ceng doo	X		X		O
長山島	O	cang san doo；鄰近雀兒嘴	X		O		—
雀兒嘴	O	ciyo el dzui	X		X		—
小平島	O	šo ping doo	X		O	作平島	O
海洋島	O	hai yang doo	O		X		—
竹山島	O	dzu sañ doo	X		X		O
廣鹿島	O	guwang lu doo	O		O		O
三山島	O	sañ sañ doo；鄰近小平島與三渠牛	X		X		O
石城島	O	si cang doo	O		O		O
三渠牛	O	sañ jioi nio	X		X		—
長山島	O	cang san. doo；鄰近鹿島	X		X		O
鹿島	O	lu doo	X		O		O
小張子	O	šo jang dze	O	作獐子島	O	作障子	O
大張子	O	da jang dze					O
皮島	O	pi doo	O	作椵島	O	作椵島	O
薪島	X	—	O		O		O
鐵山島	X	—	X		O		O

76　表中關於〈朝鮮本天下輿地圖〉的部分為楊普景所辨識，但其誤以為此圖乃王泮所繪製，特此說明。參楊普景，〈17 世紀朝鮮本天下輿地圖의考察〉，收入藤井讓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主編，《絵図・地図からみた世界像》，頁 180-189。

朝鮮半島周邊島嶼							
雲從島	O	yūñ tsung doo	X		X		—
大華島	O	da howa doo	X		X		
大青島	O	da cing doo	O		O		
小青島	X	--	O		O		
青島	O	cing doo	X		X		
喬洞	O	cio dung	O	均三面臨河，一面臨海	O	作喬棟	
江華	O	giyang hūwa	O		X		
羣山島	O	cūñ san doo	O		O		
珎島	O	jiñ doo	O		O		
大靜	O	dai jing	O		O		
濟州	O	ji jeo	O		O		
旌義	O	jing i	O		O		
漢拏山	X	--	O		X		
南海	O	nañ Hai	O		O		
巨濟水營	O	sui ing jiioi ji	O		O	作巨濟	
天城加德	O	tiyan ceng jiya de	O		O		
問山島	O	weñ san doo	O	作閑山島	O	作閑山島	
絕影島	O	juwai ing doo	O		O		
夷島	O	i doo	O	為蝦夷地	O		
鬱陵島	O	ioi ling doo	O		O		
于山島	O	ioi sañ doo	O	作丁山島	O	作平山島	
赤島	O	ci doo	O		X		
鹿屯島	O	lu tūñ doo	O		X		
黑山島	X	—	X		O		
白翎	X	—	X		O		
椒島	X	—	X		O		

資料來源及說明：筆者整理自〈北洋海岸圖〉、〈天下輿地圖〉（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朝鮮本天下輿地圖〉（首爾歷史博物館藏）及 1621 年海上朝天路之內容。標示 O 的部分，代表該圖中繪有此島，後方欄位則是該島於圖中標示的名稱。

五、金國的「海洋轉向」與東江防線潰敗

朝鮮於 1620 年代重製〈天下輿地圖〉，不過，它又是在何種歷史背景下，於 1632 到 1634 年間被繪製成如今日所見，詳實繪製東北地區的〈北洋海岸圖〉？換句話說，爲何要在 1630 年代重新畫一幅 1620 年代已繪畫過的地圖？正如 Hellman 所說，政治世界製作（political world-making）和地圖繪製有著雙向關係，對地圖需求增加反映政治現實，而地圖創作又影響現實狀況。[77]金國於天聰六年到八年，即崇禎五年到七年（1632-1634）製作此圖，對照〈北洋海岸圖〉、〈天下輿地圖〉及楊景普對〈朝鮮本天下輿地圖〉（即輿地圖戊）的島嶼標記（表 1），可發現不少差異。[78]此段時間遼東、山東、朝鮮間最舉足輕重的事件即是明代「三方部署」的東江防線逐步瀕臨崩解、天聰七年（1633）吳橋兵變孔有德（？-1652）降金。所以，若將〈北洋海岸圖〉置於此歷史脈絡下審視，可見此圖具體展現了朝鮮、大明、金國、東江等多股政治勢力，本文亦嘗試藉此解釋金國海洋政策從消極退卻轉向積極經營的演變過程。[79]

由於軍事上的威脅，金國對海洋仍重視，如天命六年六月，愛塔（即劉興祚，？-1630）抵達金州時，曾報告在海島狀況，得知：「距岸七十里海中有島名廣鹿島。」（mederi dorgi nadanju ba i dubede bisire guwang lu doo gebungge tun de）[80]此言展現金國對地理空間的調查，而劉興祚無疑是提供沿海資訊的重要人物。[81]天命八年（1623）六月大貝勒代善（1583-1648）也曾派遣人調查

77 Lisa Hellman, "Drawing the Lines: Translation and Diplomacy in the Central Asian Borderland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82:3, p. 487.

78 楊雨蕾也曾關注輿地圖戊的海島描繪，指出首爾歷史博物館藏本增加了黃海北部島嶼，展現的是明清鼎革前夕朝鮮從海上入貢因此對海島更加熟悉的狀況，參見楊雨蕾，〈關於「王泮題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的韓國藏本〉，《文獻》，2012 年第 4 期，頁 138。

79 吳橋兵變、尙可喜降金，促使明朝的東江海島防線崩潰，參見孫衛國，〈登萊事變及其對明、後金與朝鮮的影響〉，收入陳尙勝主編，《登州港與中韓交流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頁 119-142。

80 《滿文老檔》，太祖第 1 冊，頁 345。

81 例如他駐守於海邊時常匯報關於沿海見船的情事，參見《滿文老檔》，太祖第 1 冊，頁 359。

金州、旅順口的船隻數量與沿海狀況。[82]相較於天命時期多倚賴漢人的調查，〈北洋海岸圖〉所呈現的東北地區狀況，或可體現金國正在建構帝國，並已將調查成果轉化爲視覺輿圖。

爲何輿地圖丁、戊與〈北洋海岸圖〉間島嶼有所差異？楊雨蕾認爲輿地圖丁和戊中的島嶼與朝鮮海上朝天路有關，本文嘗試在其基礎上提供更進一步的分析。因努爾哈赤勢力逼近遼東半島海岸，朝鮮遂在 1617 到 1636 年改以水路前往北京朝貢。海路的朝天路線共有二條：[83]其一是經由平壤、宣沙浦、木美島、椵島（皮島）、車牛島、竹島、大小猪子島（大小張子島）、薪島、鹿島、石城島、長山島、廣鹿島、三山島、平島、皇城島、龜矶島、廟島、登州；其二則爲崇禎二年（1629）後，在袁崇煥的干預下，一方面爲了擺脫毛文龍（1576-1629）的影響，另一方面爲了在當下局勢仍可以讓朝鮮使者再見大明威儀，新的貢道從廣鹿島、平島、旅順口、鐵山嘴、南汛口、北汛口、覺華島、寧遠城。[84]1621 年海路朝天路線途經的島嶼，正符合〈北洋海岸圖〉中所標示的大部分島嶼，反而是 1629 年後途經的島嶼，有不少未見於圖中，可以再次證實：此圖呈現的資訊是落在 1620 年代。此外，〈北洋海岸圖〉的島嶼有兩種不同繪製樣貌：其一，多數島嶼僅用簡單輪廓表示；其二，則如珎珠門與山海關外海一座未標示其名的島嶼等，則採取山形水勢畫法，體現航海觀察到的地景樣貌。渤海上早在萬曆年間就已建立南岸航路和北岸航路，是遼東、山東、朝鮮往來重要孔道。[85]孫靖國也曾關注登遼水道海域，指出島嶼繪製成山形，即是體現航海過程中所觀察到的景觀樣貌。[86]珎珠門在輿地圖丁中並未被畫

82 《滿文老檔》，太祖第 2 冊，頁 806。

83 林基中，〈17 世紀的水路《燕行錄》與登州〉，收入陳尙勝主編，《登州港與中韓交流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143-157。

84 松浦章編著，《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的交流 ── 朝鮮使節與漂着船》（臺北：樂學書局，2002），頁 7、19-20；楊雨蕾，〈登州與明代朝鮮使者 ── 以《朝天錄》爲中心〉，收入陳尙勝主編，《登州港與中韓交流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158-172。

85 黃麗生，〈明代萬曆時期的島嶼議題：以《明實錄》爲中心〉，《海洋文化學刊》，期 21（2016 年 12 月），頁 1-37。

86 孫靖國，〈《山東至朝鮮運糧圖》與明清中朝海上通道〉，《歷史檔案》，2019 年第 3 期，頁 61-65。

製，但在〈北洋海岸圖〉中則用山水畫法展現雙峰夾峙、海道狹長的樣貌，正是從海上望去可看兩座小島分立左右的珎珠門實際地景。[87]由此可知，在〈北洋海岸圖〉中渤海上的島嶼，實際上是在不同脈絡下被繪製，增添了航海知識，並且作爲兩種圖層疊加體現登、遼、朝三地航海狀況的樣貌。[88]

這些島嶼除了是航海停靠站、航海朝天路外，也是大明東江防線諸據點。自努爾哈赤稱汗建國，金國對海洋拓展並不積極，甚至可謂消極。比如「東江防線」即是在此歷史背景下建構。天啓元年，遼瀋之戰結束後，明廷依照遼東經略熊廷弼（1569-1625）「三方布置」、「海上督舟師」，增設登萊巡撫管理東江一帶，希望從海上防堵女眞的拓展。[89]自天啓元年鎭江大捷後，明廷建立了皮島、覺華、蓋套、旅順、廣鹿、長山、石城、鹿島的海上防線，直到崇禎二年毛文龍（1576-1629）爲袁崇煥（1584-1630）所殺，並且在二個月後從東江撤軍到登州。毛文龍前後控制此區域長達九年。[90]

天命朝到天聰初年，渤海沿海區域仍爲東江諸將所管控，金國對於東江諸島控制遼東南方海域所形成的軍事牽制頗爲忌憚。天聰元年（1627），大貝勒阿敏（1586-1640）攻入朝鮮後曾在中和與朝鮮使者見面，宣稱出征的理由中，第四、五點均與毛文龍控制海島有關。[91]天聰二年（1628）三月，朝鮮國王李倧（1595-1649, r. 1623-1649）在書信中談到，雙方雖已對逃人問題達成協議規

87 〔明〕毛霦，《平叛記》，收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影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毛貢刻本），冊 55，卷下，頁 64。根據《登州府志》，珍珠門又稱爲寶塔門，爲沙門島（今山東省煙台市廟島群島一帶）之出入之門戶。參見〔清〕方汝翼、〔賈瑚〕修，〔清〕周悅讓、〔清〕慕榮榦纂，光緒《增修登州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影印清光緒七年[1881]刻本），冊 48，卷 3，頁 6。根據〈航海朝天圖〉中繪製的珍珠門，也確實呈現兩山聳立的樣貌，參見〈航海朝天圖〉，https://blog.daum.net/gofor99/457 （2022 年 8 月 1 日檢索）。

88 珍珠門可停泊數十艘洋船，並且爲往來直沽地區的海道咽喉，參見〔清〕佚名，《山東海疆圖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冊 22，卷 2，頁 150。該書成於清道光年間。

89 《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1，頁 543。

90 黃一農，〈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漢學研究》，卷 20 期 1（2012 年 6 月），頁 132-134。

91 《清實錄．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頁 35-39。以下簡稱《清太宗實錄》。

定，但該年正月十一日仍有約二十餘人從鎮江後山逃向海邊，疑似要投靠毛文龍。[92]天聰五年（1631）二月，皇太極（1592-1643）告訴劉氏兄弟，他並未有攻打諸島的企圖；倘若要攻打，早在毛文龍背盟時就會進軍，認爲「因小島疆土並不在其眼下」。[93]不過，主要原因在於金國對於沿海控制力薄弱，尚未有能力執行軍事行動。

正因明軍、朝鮮在海上都有明顯優勢，努爾哈赤無法與之抗衡，因此對於沿海採取類似「遷界」的命令。天命六年，毛文龍突擊鎮江後，努爾哈赤下令遷鎮江沿海居民於內地，並將金州居民移往復州。[94]天命八年四月，因爲毛文龍屢屢唆使南海（julergi mederi）沿海住民殺人叛逃、金國進而實施「遷移」（guribuhe）政策。[95]天命九年（1624）正月，莽古爾泰（1587-1633）率兵攻占旅順口後，隨即毀城而還。[96]換言之，在天命年間，金國執行了遷移政策，放棄沿海區域。遷移的範圍多廣？天命六年八月，金國下令將沿海黃骨島、石嘴堡、望海堝、歸化堡等處軍民遷入距海六十里之處。[97]次年二月，再將遺留在沿海的居民遷回。[98]八年六月，努爾哈赤告知駐守南海的諸大臣，要求邊境五十里內、五里之外則草肥之處駐紮騎兵，並逮捕逃人。遷界範圍從六十里改變爲五十里，十里的差距，意味著範圍上的緩衝與變化。[99]整體而言，遷移政策的遷徙人口、毀壞城寨的舉措，與明初、清初有關的墟地徙民、遷界令，避免沿海勢力之侵擾，有異曲同工之妙。[100]

---

92 《清太宗實錄》，卷 4，頁 58。
93 黃一農，〈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漢學研究》，卷 20 期 1，頁 143。
94 《滿洲實錄》，卷 7，頁 335。
95 《滿文老檔》，太祖第 2 冊，頁 717。
96 《清實錄．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9，頁 126。以下簡稱《清太祖實錄》。
97 《滿文老檔》，太祖第 1 冊，頁 367。
98 《滿文老檔》，太祖第 2 冊，頁 525。
99 《滿文老檔》，太祖第 2 冊，頁 804。
100 參見何孟興，〈洗島靖海：論明初福建的「墟地徙民」措施〉，《興大歷史學報》，期 22（2010 年 2 月），頁 1-20。

隨著袁崇煥殺毛文龍、出力甚鉅的劉興祚、劉興治（？-1631）等七兄弟控制東江諸島的「後毛文龍時代」來臨，皇太極即位後也逐步修正對於東江諸島的政治、軍事態度。天聰二年二月，皇太極致書李倧，金國曾在定盟後派軍駐守義州，「防島人登岸」，朝鮮回信稱：「云漢人浮水，狎如鳧鷗，我亦無可如何。若彼登岸，我自不相容，必當逐之；逐之不可，即與之戰；戰之不能，即當報聞。」皇太極也責怪說，最初朝鮮曾允諾不許漢人登岸，但這時不僅允諾漢人登岸，更將來自金國的逃人送往東江諸島。[101]這幾段描述也揭示，朝鮮與東江在沿海、海洋上對金國國家、社會造成威脅，連帶引起金國的防備之心。同時，也可發現金國明確指出「明」、朝鮮、「島」三個不同的勢力。正如崇禎三年（1630），劉興沛抵達瀋陽後，金國在與劉氏兄弟誓盟的文書中，滿文部分與 aisin gurun i han 對等者爲 mederi tun，可見金國將東江諸島視爲「平等的友邦」。[102]與之相對應的是這類型官方文書的書寫，例如天聰七年八月，皇太極致書朝鮮國王時提及「我兩國誓告天地，各守疆土。」[103]也就是說，因爲東江諸將早在毛文龍時代就偏安一角，之後的劉氏兄弟更嘗試建立周旋於明、金之間的基業，〈北洋海岸圖〉所展現的就不僅是大明、朝鮮、金國的政治版圖，而是加上東江諸島，呈現四個「勢力」之現實局勢。

金國對於沿海態度從遷移政策到積極的轉折，是在天聰七年左右。該年十月，皇太極召集文館滿、漢官員，宣稱：「爾漢啓心郎、生員等疏奏，動輒以渡海取山東，攻險固之山海關爲言。猶如取他人麵餅以祭天星，爾等全然不顧他人勞苦，豈非欲渡海者沒於水，攻險者致損其兵乎？」[104]此建言中，可見漢人對於渡海的建議。不過與此同時，此政權也迎來努爾哈赤以來懼海之尾聲，因爲在此宣示的前一個月，天聰七年九月，金國大舉賞賜因爲造船、參與海戰，

[101] 《清太宗實錄》，卷 13，頁 184-185。
[102] 黃一農，〈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卷 20 期 1，頁 140；王志強，〈《金國汗黃台吉與海島劉興治等告天盟書》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 年第 2 期，頁 61。
[10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冊，頁 29。
[10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冊，頁 41-42。

在旅順口、「虎爾哈」的「瓦爾喀海中九島」獲得戰功者。[105]金國得以向海洋積極拓展的關鍵，在於掌握建造戰船、應付水戰的能力。受到皇太極之離間和招降，崇禎三年四月，駐皮島的都司劉興治殺副總兵陳繼盛叛變，而皇太極「還希望能掌握利用興治所率領的水師」。[106]基於需求，金國不僅向朝鮮索取水師，並覬覦劉氏兄弟水師，更在天聰七年八月得到孔有德、耿仲明（1604-1649）的水師和旅順口的船隻。皇太極因而驕傲地宣稱：「我統兵諸貝勒暨滿漢蒙古大臣，俱云宜乘此舟楫，盡勦諸島。」[107]十一月，皇太極派遣英俄爾岱（1596-1648）帶著國書二函給予李倧，列出十項條目中的第六、七分別談到：「孔有德、耿仲明航海歸我，爾國截戰二次」；「孔有德、耿仲明來後，留我兵守船，爾國復攻擊一次。似此攻擊，豈非搆兵？」[108]因此，天聰七年獲得水師艦隊，加速了金國對沿海從抗拒到積極的改變。

崇禎四年（1631）閏十一月，吳橋兵變爆發後，孔有德、耿仲明竄行山東年餘。[109]金國藉機主動向諸島進行調查，天聰七年五月，濟爾哈朗等率兵前往旅順口迎接渡海而來的孔有德時，明軍寧遠、登州、旅順口的軍隊以水師追擊，而孔有德等人則招廣鹿、長山等島將領兵丁欲從鎮江登岸，朝鮮也派軍協助明軍攻打，直到明、朝聯軍遇到金國部隊後才撤退。[110]同年六月，金國偵知孔有德等人退住獐子島一事。[111]十一月，皇太極派季思哈（？-？）、吳巴海（？-1639）率領三百士兵前往征討與朝鮮接壤的虎爾哈部落「及島中餘孽」。[112]隔年元月，明廣路島副總兵尚可喜（1604-1676）掠廣鹿島、長山島等島投降；四月，皇太極讚譽其降導致「殘破海防」，對金國大有助益，更特別提到「航海來歸，

10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冊，頁 36-38。
106 黃一農，〈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漢學研究》，卷 20 期 1，頁 138。
107 《清太宗實錄》，卷 15，頁 203。
108 《清太宗實錄》，卷 16，頁 216-217。
109 可參見黃一農，〈吳橋兵變：明清鼎革的一條重要導火線〉，《清華學報》，新卷 42 期 1（2012 年 3 月），頁 79-133。
110 《清太宗實錄》，卷 14，頁 190-191。
111 《清太宗實錄》，卷 14，頁 194-198。
112 《清太宗實錄》，卷 16，頁 217-218。

偉績豐功」。[113]天聰十年（1636）三月，金軍已可抵達外海島嶼進行巡視。[114]又，天聰八年五月，金國稱「若敵兵乘船來侵，非一夕所能驟至，我必先瞭見之」。換言之，相較於先前遷移政策時期，金國在臨海區域已有較妥善防衛，不然難以遠眺偵測到敵軍。另一個證據則是杜度（1597-1642）請教皇太極，是否仍需要「每月三次遣人捉生於旅順口」，皇太極則說：「不必一月三遣，閱二十日一往可也。」[115]因此，在天聰七年以後，隨著東江防線主要將領相繼離世或歸降，金國不僅擁有水師和造船技術，可以主動向外拓展，對沿海控制亦趨於全面。

東江防線在此後遭受毀滅性打擊：崇禎六年（1633）七月岳託（1599-1639）、孔有德等攻陷旅順口；七年尚可喜投降金國；崇德二年（1637）皇太極遣阿濟格（1605-1651）攻陷皮島；崇德三年（1638），沈志祥（？-1648）從石城島降清。同年，明廷撤島。[116]〈北洋海岸圖〉的繪製，正值東江防線的「後毛文龍時代」覆滅後，孔有德叛變渡海投降之時。皇太極自天聰二年後逐步改變過去努爾哈赤時期對沿海遷移政策，但受限於缺乏水師，直到天聰七年，皇太極才擁有能夠主動出擊，奪取東江和鄰近海域勢力的水師。同時，皇太極在各種滿文文書中都將朝鮮、東江島嶼諸將視爲同等勢力，建構政治劃分的世界觀，這也正是〈北洋海岸圖〉中的政治實體。此外，這一時期也是皇太極持續強化汗權之階段：自天聰三年（1629）起打壓其他貝勒、重用漢官，直到六年正月定行禮儀制，獨坐南面。[117]〈北洋海岸圖〉繪製之時，不僅適逢金國軍事上的活動，也正逢皇太極逐步建立其「帝國」之時。例如天聰七年元月，

1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冊，頁 59-60；《清太宗實錄》，卷 18，頁 238。

114　《滿文老檔》，太宗第 3 冊，頁 965。

115　《清太宗實錄》，卷 18，頁 242-244。

116　黃一農，〈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卷 20 期 1，頁 157-158。

117　蔡偉傑，〈論清朝滿漢二元文化結構的形成與其意義〉，《中國邊政》，期 170（2007 年 6 月），頁 81-108。另外，聚焦於滿洲家族在氏族政治和皇權政治間變動之討論，可參見葉高樹，〈滿洲親貴與清初政治：都英額地方赫舍里家族的個案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43（2010 年 6 月），頁 173-230；〈滿洲軍事家族與清初政治：長白山鈕祜祿家族的個案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46（2011 年 12 月），頁 169-230。

皇太極指責朝鮮與明朝交易，要求朝鮮出兵船三百協助征明、攻取海島，即稱：「縱云島人稀少，可將見在者，儘朕取之。」[118]最後一段暗示，攻打海島的目的不是基於人力資源需求，而有政治層面的考量——尤其這些島嶼所處的位置，正是下節所說的南海（julergi mederi）。下一節即嘗試從政治文化認識金國對於海洋和帝國建構之間的關係。

六、自然觀、現實與想像的各海洋

〈北洋海岸圖〉製作於金國瓦解東江防線、攫獲水師、主動控制海域時期，亦是皇太極強化汗權的階段，那〈北洋海岸圖〉是否也暗示類似的狀況？本節旨在論述〈北洋海岸圖〉中所展現金國入關前的海域認識，包括圖中描繪源自長白山的三條河流分別進入三處海域，構成了皇太極稱帝時所利用的政治概念，更呈現一種異於漢文化四海天下觀的滿洲「三海」的宇宙觀。

首先，傳統漢文化上，從戰國時代開始，「四海」和「九州」都是狹義的天下代名詞。其中，四海在戰國時代有蠻夷戎狄之地的概念，另一種用法則意指「海洋」；而廣義的天下則蘊含著九州、四海和其他區域所形成的地理與世界範圍。[119]直到漢代，「四海」也與國家、天下畫上等號。[120]四海乃是中華帝國結合疆域與正統性，並納入帝王語彙的政治符號。明代亦承襲此觀念，其治下漢人也受其薰陶，並於明金對峙時期，將此概念帶入金國。如天聰五年（1631）九月，達海（1595-1632）與被俘虜的明太僕寺卿監軍道張春的對話中，張春表示：「天下四海爲一海，四海之民爲一家。」（abkai fejiergi duin mederi emu mederi duin mederi dorgi irgen emu boo）[121]又崇德元年（1636）十月，錦州漢

118 《清太宗實錄》，卷 13，頁 180。

119 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卷 27 期 3（2009 年 9 月），頁 169-256。

120 管東貴，〈整體觀與歷史研究——以中國古代封建制的變遷爲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25（1997 年 6 月），頁 1-14。

121 《滿文老檔》，太宗第 2 冊，頁 570。

人崔應時（？-？）呈遞金國的文書中，也是稱「四海」（duin mederi）。[122]此紀錄顯示當時明朝確有「四海」觀念，但《滿文老檔》中這類說法均來自明方漢人，金國卻沒有類似言論。又崇德三年元旦，三順王所上的慶賀文中，也稱「蕩條〔滌〕四海」；同年十月二十五日，皇太極誕辰時眾官員所呈上的慶賀文中，續順公沈志祥與其部的慶賀文中有「布仁政及四海」一詞。[123]另外，同年七月初六日皇太極致蒙古喀爾喀部的文告中稱：「昔遼、元、金三國之主征戰時，西至西梵國，東抵朝鮮，北至黑龍江，南至於海。」文中特別稱南界爲「海」而非南海，或許反映了他彼時的世界觀。[124]相互比較下，可以發現僅有漢人才會使用四海這樣的詞彙；對滿洲人而言，這是來自異文化的世界觀。[125]

既然金國沒有「四海」，那他們擁有甚麼與海洋有關的政治、世界觀呢？天命十一年（1626）閏六月，皇太極致書蒙古稱：「上天眷佑我，自東海以西至山海關爲止的地方，將葉赫、哈達、烏拉、輝發、廣寧、遼東等處賜予我。」（abka mimbe urušefi dergi mederi ci wasihūn šanaha ci ebsi yehe hada ula hoifa guwangning liyoodung ni ba babe siran siran i abkai bure be）[126]天聰十年二月，上尊號予皇太極：「東至東海，西至唐古特國，北至海，各地諸國皆願臣服。」（wesihun dergi mederi de isitala, wasihūn tanggūt gurun de niketele, amasi amargi mederi de isitala, ba ba i gurun gemu buyeme dahaha）[127]在這些行文中，對應漢文的「海」之滿文爲 mederi；滿文 mederi（海）的定義爲：「凡眾河之水匯集漫溢，此極大之水域，即稱之爲『海』。正如《詩經．小雅．沔水》篇所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iten birai muke isanara deserepi umesi amba muke be mederi sembi. ši ging ni siyoo ya i miyan šui fiyelen de bilteme eyere

122 《滿文老檔》，太宗第 4 冊，頁 1325。
12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冊，頁 259、437。
12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冊，頁 326。
125 另外一個例子呼應「蒙古」，則是滿人最早以蒙文使用「四海」這個詞彙，要到順治八年（1651）八月十九日加尊皇太后書時，用蒙古文寫下「四海之歡心」的用語。參見希都日古編譯，《清內秘書院蒙古文檔案匯編漢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 173。
126 《滿文老檔》，太祖第 3 冊，頁 1083。
127 《滿文老檔》，太宗第 3 冊，頁 906。

muke mederi de acaname isambi sehebi）[128]可以發現入關前金國的世界觀中，有東、南海二處許多河流注入之廣大水體空間。

〈天下輿地圖〉和〈北洋海岸圖〉在東北地區雖有顯著的差異，但均畫出自長白山進入大海的三條河流。[129]長白山地區和滿洲族群神話的建構關係密切，《天聰九年檔》已揭示皇太極建構了滿洲族群神話，尤其是三仙女呑果誕下滿洲始祖庫布里雍順，並且居住於布庫哩山的布勒瑚里湖之故事。此故事源自黑龍江虎爾哈部落——遭皇太極下令水師攻打的部落——於天聰九年（1635）五月晉見皇太極時提供之部落故事。[130]虎爾哈部落在皇太極擁有水師後被降伏，在天聰元年十二月、二年五月，滿人對此部落地理空間描述是：「長白山彼端東海。」（šanggiyan alin i cargi dergi mederi）[131]不僅揭示了東海和長白山之間的地理關係，更反映了金國是居於長白山西側的觀察視角。

學界對《滿洲實錄》和《清太祖實錄》等史料並不陌生，知悉在在金國入關前的地理宇宙觀中，東北地區存在著北、南、東三處海域。《滿洲實錄》對長白山有著如下描述：「長白山高約二百里，週圍約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闥門，週圍約八十里。鴨綠、混同、愛滹三江俱從此山流出。鴨綠江自山南瀉出，向西流直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瀉出，向北流直入北海；愛滹江

128 〔清〕馬齊、〔清〕馬爾漢等撰，《御製清文鑑》（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卷 1，頁 40。該書成於康熙年間。

129 類似的畫法在 1530 年成書的《新增東國輿地勝覽》也有類似的地景呈現，不過河流源頭不似〈北洋海岸圖〉源自一山，而是來自一個區域的多座山頭。參見劉小萌，《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頁 6。

130 劉厚生，〈評皇太極在明清決戰前夕的重大舉措——從滿文《天聰九年檔》所見〉，《中國邊政》，期 170（2007 年 6 月），頁 154-155。吳雪娟聚焦考察康熙年間東北地區的滿文地圖，也提到：「《滿文原檔》所載滿洲始祖發源地爲 bukūri alin，『布庫里山』和 bulhūri omo『布爾瑚里湖』，正是第 77 號 bokori alin『博科哩山』、第 104 號 bolhūri omo『博爾胡哩泊』。伴隨滿文《國史院檔》、《太祖高皇帝實錄》、《太祖高皇帝本紀》、《滿洲源流考》的宣揚，滿洲始祖發源於長白山之說得到官方和民間的公認，同名之山與湖也出現在清初滿文輿圖上的長白山地區。」吳雪娟，〈論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的命名〉，《滿語研究》，2019 年第 1 期，頁 96。張華克認爲是位於俄羅斯境內的鏡泊湖，不過許多學者過往的研究中也闡述該湖直到康熙皇帝時才調查、裁定該處爲長白山天池。張華克，〈布勒瑚里湖考略〉，《中國邊政》，期 208（2016 年 12 月），頁 119-158。

131 《滿文老檔》，太宗第 1 冊，頁 114、133。

向東流，直入東海。」[132]《清太祖實錄》有如下描述：「是山高二百餘里，綿亙千餘里。樹峻極之雄觀，萃扶輿之靈氣，山之上有潭曰闥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滹三江之水出焉。鴨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滹江東流入東海。三江孕奇毓異，所產珠璣珍貝，為世寶重，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生。每夏日，環山之獸，畢棲息其中。」[133]雖然學者認為這些是在順治、康熙朝後才形成的說法。[134]然而，〈北洋海岸圖〉早在 1632 到 1634 年間，就已可以見到後修《滿洲實錄》所建構的「山—河—海」之空間宇宙觀。康熙朝通過詳盡調查後，《清太祖實錄》強調「樹峻極之雄觀，萃扶輿之靈氣」，即是入關後將長白山上的瑞樹、天池作為聖地和發祥之地。[135]也就是，根據入關前對 mederi 一字的運用和「二海」的使用，配合〈北洋海岸圖〉，可發現「山—河—海」的結構在日後被重新形塑成「樹—潭—山—河—海」。

假若皇太極稱帝時稱其疆界抵達東海、南海，那此二海在滿文材料中又如何被描述呢？天命八年二月，滿文檔案出現：「駐守南海沿岸之一旗七百兵內，由遊擊等率二百兵駐守。」（julergi mederi jakarame tehe emu gūsai nadan tanggū cooha be juwe tanggū cooha be iogi sa gaifi te）[136]此為「南海」（julergi mederi）首次作為一個空間詞彙出現；同月也有「譚拜赴南海方向駐守」（tereci tambai julergi mederi ergi de anafu tem genefi）。[137]隨著軍事征討，金國對此區域的認知愈來愈清晰，例如天命十一年正月，努爾哈赤率兵挺進寧遠，在渡過遼河後軍分左右翼，其中一翼「直屆南海岸」；後與明軍滿桂（？-1630）、袁崇煥、

132 《滿洲實錄》，卷 1，頁 1-2。
133 《清太祖實錄》，卷 1，頁 22。
134 參見王學玲，〈在地景上書寫帝國圖像——清初賦中的「長白山」〉，《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27（2005 年 9 月），頁 91-121；張華克，〈《滿州實錄》前三卷插圖內容解析（上）〉，《中國邊政》，期 222（2020 年 12 月），頁 135-176。
135 張華克認為該處是位於俄羅斯境內的鏡泊湖，參見張華克，〈布勒瑚里湖考略〉，《中國邊政》，期 208，頁 119-158；〈《滿州實錄》前三卷插圖內容解析（上）〉，《中國邊政》，期 222，頁 135-176。
136 《滿文老檔》，太祖第 2 冊，頁 661。
137 《滿文老檔》，太祖第 2 冊，頁 667。

祖大壽等大戰數日，「聞寧遠城南十六里外，海中有覺華島」，努爾哈赤令吳訥格（？-？）率領八旗蒙古軍隊趁海面冰封奪取明軍屯糧地覺華島。[138]天聰二年四月稱毛文龍所占據的區域是「南海皮島」；[139]四年（1630）十月南海島（julergi mederi tun）的劉五派來使者。[140]天聰五年五月，金國派遣滿達爾漢（？-1646）和董納密（？-？）作爲使者送朝鮮人返國，順帶給朝鮮國王李倧書信，其中提到將「往征南海諸島」。[141]次月，金軍已有「征南海島總兵官楞額禮、喀克篤禮」。[142]也就是說，至少自天命八年起，滿文文書已定義出「南海」。[143]可見此空間的出現與實際上的軍事狀況息息相關。例如前述皇太極稱帝時所使用的語彙，稱「東至東海，西至唐古特國，北至北海」；由於當時的「南海」要到崇德三年沈志祥降清、東江瓦解後才完全控制，所以此一誥諭頗能反映眞實狀態。[144]

另一個海域是「東海」（dergi mederi），林士鉉指出清代地圖將庫葉等地稱爲東海。[145]《滿文老檔》中以兩類說法描述「東海」，第一類例如 šun dekdere ergi dubede dergi mederi、šun dekdere baru mederi 或 šun dekdere ergi mederi 等，

138 《清太祖實錄》，卷 10，頁 133-134。
139 《清太宗實錄》，卷 4，頁 59。
140 《滿文老檔》，太宗第 1 冊，頁 434。
141 《清太宗實錄》，卷 9，頁 122-123。
142 《清太宗實錄》，卷 9，頁 124。不過，皮島新任總兵黃龍、贊畫副總兵張燾率兵船與葡萄牙公沙的西勞等葡萄牙隨軍將士以西洋大砲擊敗之，時人稱爲「海外從來一大捷」。黃一農，〈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卷 20 期 1，頁 156。
143 《清太宗實錄》，卷 4，頁 59。此處所謂的首次，是扣除描繪長白山發源產生的北、南、東海之描述。相同概念下，西海的首次出現是天聰八年五月，稱察哈爾「逃往西海地方」，並稱該處位置與打草灘地方距離約十日路程；參見《清太宗實錄》，卷 18，頁 241-242、卷 20，頁 263。北海一詞首次出現於天聰十年二月，上尊號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是以明洪武初收併群方，定號於金陵，然後北逐大元，以成一統。我皇上寬仁厚德，博施濟眾，國中就治藩服傾心，恩膏普被，浹髓淪肌，中心誠服，無異父子兄弟之相親也。以故東漸於海，西抵湯古忒，北至北海，各國歸附。」參見《清太宗實錄》，卷 27，頁 348。東海則是最早出現的詞彙，在萬曆十一年（1583）左右就稱東側諸部落位處東海，參見《清太祖實錄》，卷 1，頁 25。
144 黃一農，〈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卷 20 期 1，頁 157-158。
145 林士鉉，〈極東邊民：《皇清職貢圖》裡的庫野〉，《民族學界》，期 45（2020 年 4 月），頁 107-158。

均是指太陽升起處的「海域」，[146]另一類則單純描述 dergi mederi（東海）；在多數的滿文書寫語境下，二者是相同的。[147]天命二年（1617）首次有「東海地界」的描述，在滿文中則稱 dergi mederi jakarame。[148]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1616），《滿文老檔》載：「自明國以東直到東海之岸、自朝鮮以北、自蒙古以南，所有女眞國各處之兵於郊野集結。」（nikan ci wesihun šun dekdere baru mederi dalin de isitala, solho ci amasi, monggo ci julesi, jušen gurun i ba ba i cooha be tala de acaci）。[149]天命四年（1619）八月：「葉赫自此滅矣。滿洲國自東海至遼邊，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鮮鴨綠江，同一語音者俱征服。是年諸部始合爲一。」[150]這些描述都是類似的概念。天命十年正月，「征剿近東海而居的瓦爾喀」（dergi mederi hanci tehe warka be coohala seme unggihe），此處描述證實東海是可接觸的地理實體。[151]天聰七年十一月，金國使者英俄爾岱前往朝鮮時，指責朝鮮在邊界修築七座城，意在抵抗金軍；金國驕傲地稱這七城毫無作用，因爲：「東海以西，義州以東，各路進兵，孰得而禦之。」[152]九年六月，金軍分別在察哈爾、黑龍江、寧錦、東海等地有所斬獲，皇太極趁機在回覆朝鮮國王書信時闡述在邊境的勝利：「東海之役，亦收獲六千餘人。」[153]在大清建立後，崇德二年閏四月宴請朝鮮王子、貝勒、文武群臣時，皇太極要求朝鮮王子在旁觀賞：「此黑狐皮乃東海濱使犬國每年所貢。」皇太極又告以「因遠方罕見之物，故令爾等觀之」。[154]據此，相對於南海隨著軍事擴張而出

146 《滿文老檔》，太祖第 1 冊，頁 50、63、241。
147 《滿文老檔》，太祖第 1 冊，頁 77。例如在談到東海熬煮鹽一事時，就有天命五年（1620）六月的 šun dekdere ergi mederi 和天命六年二月的 dergi mederi，以兩種說法稱呼同一地方。參見《滿文老檔》，太祖第 1 冊，頁 241、260。
148 《滿洲實錄》，卷 4，頁 192-193；《滿文老檔》，太祖第 1 冊，頁 77。
149 《滿文老檔》，太祖第 1 冊，頁 63。
150 《滿洲實錄》，卷 6，頁 283-284。
151 《滿文老檔》，太祖第 3 冊，頁 958。
152 《清太宗實錄》，卷 16，頁 216-217。
153 《清太宗實錄》，卷 23，頁 309-310。
154 《清太宗實錄》，卷 35，頁 448。

現，東海是一種原生的地理空間，只是從原先「日出之處」隨著征服東海沿岸部落，逐漸擴大轉變成具有實體的海域空間。

相較於前述的南海和東海分別意味著軍事、地理的空間概念，《滿洲實錄》雖稱北海是混同江所注入之處，〈北洋海岸圖〉也清楚地畫出該河流和注入的海域，但「北海」一詞未曾在《滿文老檔》中出現。即使《清太宗實錄》記載天聰十年二月皇太極稱帝曾言：「以故東漸於海，西抵湯古忒，北至北海，各國歸附。」[155]但滿文並未提到北海，而稱「北至海」（amasi mederi de isitala），也就是說北部存在一處實際海域，呼應〈北洋海岸圖〉內，從河到海的概念，暗示此水域空間之存在。這幅圖在金國編繪過程中，增加了許多東北空間資訊。此圖完成於天聰六到八年，但要到天聰八年十二月後，皇太極才逐步用兵黑龍江地區（即是後來空間上的北海），穩固其後方，並且在該地區拓展經濟、補充勞動力。[156]不過，〈北洋海岸圖〉畫有一處「夷島」，頗值得玩味。雖然從方位和形狀來看，此島似乎更接近〈天下輿地圖〉中的對馬島，但地圖中對此地的描繪存在兩種可能性。其一，因爲紙幅限制，繪圖者用對馬島形狀代表位於這片海域上的諸島（日本、蝦夷、對馬等）。[157]不過，還有另一種可能性，考量到當時地圖知識傳承會使用相同名詞描述同一地點，〈北洋海岸圖〉中的「夷島」可能承接〈天下輿地圖〉中、當時稱爲「蝦夷地」的北海道地區。[158]早在壬辰戰爭和幕府初期，德川家康就已經注意到女真勢力的興起，以及對蝦夷地的可能連結。[159]在清代，蝦夷地與附近地區被視爲位處黑龍江出海口處。[160]根據前述，或許可以進一步推想：〈北洋海岸圖〉中的「夷島」既然呼

155 《清太宗實錄》，卷 27，頁 347-348。
156 劉厚生，〈評皇太極在明清決戰前夕的重大舉措——從滿文《天聰九年檔》所見〉，《中國邊政》，期 170，頁 150-151。
157 感謝匿名審查人之建議。
158 另外，在法國藏〈天下輿地圖〉中，夷島南方，在日本本州島上還有一處標註「夷地」之處。
159 Mizuno Norihito, "China in Tokugawa Foreign Relations: The Tokugawa Bakufu's Perception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Ming-Qing China,"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 15 (2003), p. 136.
160 菊池勇夫，〈蝦夷島と北方世界〉，收入氏編，《蝦夷島と北方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61-62。

應的是〈天下輿地圖〉中的蝦夷地，就不僅僅是一處隨意地名的標示，更可能是符合此後文獻敘述中最常出現的、黑龍江／混同江出海注入「北海」區域之島嶼，只是這確實還需要更多的證據提供證明。

入關後，大清承襲漢文化的四海觀念；入關前的三海觀，則由長白山三江奔流入三海所揭示，金國以此表述大明、金國／大清、朝鮮三國的海域。自明代以來，朝鮮對於江南地域的認識，較強調長江以南地區，尤其是杭州；[161]對山海關這道人造宏偉建築，更是附加上抵禦外虜的中華上國意念；清代則是添入華夷變態的現實，成爲一種添附情感的地理空間。[162]這樣的情感空間，最後也體現於想像的地理上。〈北洋海岸圖〉中，除了渤海灣和朝鮮半島的附屬島嶼外，也繪製了關於山東、江南沿岸等許多區域，不少縣、驛、巡司雖臨海或是距海不遠，但都不是所謂「島嶼」，而是被河流切割的臨海區域。可是根據「水體」的三種畫法，會發現圖中許多地區都被繪製成被海隔離於大陸之外的島嶼。這些島嶼在〈天下輿地圖〉中是被河水所區隔，類似的還有朝鮮的江華島和喬洞島。[163]配合前述「夷島」，還有珍珠門與東江諸島的交通意義，如此描繪體現了女眞人對於尚未占領區域的地理認識。

李紀祥曾經通過中國輿圖進入西歐世界地圖繪製脈絡之過程，探索西方世界對東方從「未知」轉變爲「想像」之接受過程。[164]〈北洋海岸圖〉亦呈現相似的脈絡。此圖原爲朝鮮用來闡述天下地理空間，但在金國重製後，卻展示出不同的側重面相和海洋認知。誠然，海洋並非原始圖像的核心，卻成爲揭露女

161 楊雨蕾，〈明清朝鮮文人的江南意象〉，《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0 年第 6 期，頁 141-149。

162 黃普基，〈明清朝鮮使者筆下的山海關〉，《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 年第 4 期，頁 81-85。

163 當時對於海外陌生土地或島嶼，地圖的描繪往往並不確切，也容易各有出入，例如在〈北洋海岸圖〉中，江南地區泰州被海洋包圍，成爲海島，但在〈天下輿地圖〉中，該地區有一側爲河流所環繞，顯見金國政權並不熟悉該處。再者，帝國即便擴張，對於地理空間感到生疏的情形仍會有之，例如清廷與鄭氏對峙時，也曾需通過訊問俘虜，來調查安海、廈門等地究竟是海島，或是緊鄰大陸。參見參見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冊 1，頁 280-284。

164 李紀祥，〈輿圖史與接受史中的海國與大地──清季世界新圖之分型〉，《輔仁歷史學報》，期 22（2009 年 1 月），頁 27-94。

員自身認識與想像海洋的關鍵。Michael Biggs 藉由歐洲製圖學家調查國家與領土間關係、進而製圖的過程，討論知識與權力之間的互動；地圖知識的獲得並非意味著精確或是細節，而是蘊含著理性化統治。因此當一個區域被「地圖化」，意味著進入國家理解土地的範疇。[165]金國在天聰六年到八年繪製的〈北洋海岸圖〉，正是在此概念下展現其控制的國家疆域和海域認識。據此，金國確實通過海洋空間接合了當時空下的世界觀，一個蘊含二海或三海、具有金國特色的世界觀。對於遙遠的大明沿海，〈北洋海岸圖〉則是經驗法則和想像揉雜而成的產品。[166]正如帝國拓展過程中，往往也會通過製圖學來「發明」新的領土，[167]〈北洋海岸圖〉所反映的或是金國時期的三海空間。

七、結　論

作爲內亞帝國，清帝國用滿文標示地名和拼音，使地圖成爲將地區鑲嵌入帝國結構的工具。[168]過往學者對於地圖知識的流傳和空間再發明，已經有許多討論，例如歐立德（Mark C. Elliott）即曾指出，清帝國是如何在耶穌會傳教士的製圖技術和知識協助下，將未經劃分的邊疆建構成爲所謂的「大盛京」（Greater Mukden），以利帝國控制；[169]又有學者指出，針對包括金國在內，許多國家都曾通過朝鮮獲取地圖、建立更深刻的東亞世界認識，例如日本連續

165 Michael Biggs, "Putting the State on the Map: Cartography, Territory, and European State Form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1:2 (April 1999), pp. 374-405.

166 例如西班牙帝國拓展過程中，也在地圖上「發明」了尚未占領的「環太平洋」，參見 Bronwen Douglas, "Imagined Futures in the Past: Empire, Place, Race, and Nation in the Mapping Oceania," in Warwick Anderson, Miranda Johnson, and Barbara Brookes, eds., *Pacific Futures: Past and Present*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8), pp. 131-154.

167 Ricardo Padrón, "A Sea of Denial: The Early Modern Spanish Invention of the Pacific Rim," *Hispanic Review*, 77:1 (Winter 2009), pp. 1-27.

168 濮德培著，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頁 464-465、473。

169 Mark C.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3 (August 2000), pp. 603-646.

在朝鮮仁祖十八、十九年（1640、1641），通過對馬島主請朝鮮提供地圖。[170] 對於清帝國地圖繪製之分析，無論滿、漢甚至其他語言之地圖，已經積累許多成果。然而，金國卻常常被排除在東亞諸國地圖知識交流的討論外，也未受到「清代」地圖史研究者的重視，形成研究上的缺憾，也導致後世以為金國未曾積極描繪地圖，相較於周圍諸國，其地圖知識網絡居於被動地位。

本文考證〈北洋海岸圖〉如何從大明、朝鮮最後流傳到金國的過程，最後變成一幅結合多重知識的地圖。若說白君可在十六世紀末獲得刻板印製的〈天下輿地圖〉甲聚焦於大明地區，是桂萼、羅洪先地圖脈絡下的承繼者；1620年代朝鮮為了調查東北女真空間而重製的輿地圖丁，則增添了朝鮮、日本，展現更大的東亞、東南亞地圖。雖然我們僅能見到〈北洋海岸圖〉整幅大圖的右上角，但作為系列地圖的承繼者之一，東北地區與東江海域明顯是此圖的側重之處。換言之，這一系列地圖知識的流傳，呈現了金國在追求地理空間知識的狀況下，繪製了更為詳盡的地圖，反映當時軍事、政治、文化面向。

〈北洋海岸圖〉具有其時代意義。金國汗皇太極自即位之初，就想擺脫其父努爾哈赤建立的共政體制，在增加、重用漢官之餘，軍事、政治上的改革也都是其手段。攻伐朝鮮並與之建立兄弟之盟，意在擴展其「非正式帝國」的範疇。[171]所謂的非正式帝國，是指通過經濟、外交等手段而非軍事兼併，拓展帝國影響力。在此概念下，東江諸島被皇太極視為帝國建構的目標，也符合〈北洋海岸圖〉中展現東江島嶼的意涵。這些島嶼不僅是東江鎮控制的範圍，同時也是朝鮮因應金國興起後循海路繼續朝貢的路線。〈北洋海岸圖〉揭示了皇太極眼中的世界，是一個包含蝦夷地、朝鮮、大明、東江、金國的東北亞政治與地理世界觀，其中某些區域很可能是他欲積極拓展疆界的目標所在。崇德七年（1642）七月，他在談及朝鮮、大清疆域分野時，稱：「或兩國人有乘船捕魚、

170 《朝鮮仁祖實錄》，卷 40，頁 30；卷 42，頁 1。此外，張存武早已關注大清與朝鮮間疆界調查、繪製地圖等問題，參見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178-246。

171 關於朝鮮與清朝的關係，可參見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 1-13。

海中往來者，爾國自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沿海至黃城島以西爲界，我國於黃城島以東爲界，若兩國有越境妄行者，亦俱察出處死。」[172]又以天聰二年正月致毛文龍的文書爲例，由於此文當是用漢文書寫，再譯爲滿文，其中一句原文該是「我海外地方」，在滿文中寫爲 minde mederi tulergi。[173]雖然這也可能是直接的翻譯，但若考量皇太極繼位後對於蒙古 tulergi golo（外路）的概念，不免令人思考，此時的滿文用語也呼應著金國對於海域之分類。[174]

〈北洋海岸圖〉更揭露文化與政治正統、世界觀內涵，長白山發源的三條河流分注入北、南、東海，與漢文化的「天下四海」概念有所不同。這一點，從《滿文老檔》中漢人和滿人說法上的出入，可略見端倪。三海的建構各有不同起源，南海是先政治、軍事，才逐步轉換成爲一個地理空間；東海則是先有地理空間，北海則是文化建構在前所產生的結果。過往學者都同意，康熙朝調查東北地區後將長白山、天池視爲發源聖山，也認爲三河流入三海爲順治朝以後所創建。但是根據〈北洋海岸圖〉，能夠清楚地認識到符合滿文 mederi 原始定義的「河流匯集之漫漫大水處」，早已呈現在此圖中。

如布琮任（Ronald C. Po）指出，通過分析地圖描繪，即使無法與歐洲諸國相提並論，清帝國在十八世紀起就已有朝向海洋拓展積極的一面。[175]本文嘗試延續布琮任的論點，認爲早在金國時期，就已通過繪製海疆地圖，而有類似的表現。本文運用非漢語材料、地圖，嘗試理解大清／金國對於海洋的認識是否有其特殊性，如何有益於其建構帝國，或可充作「新清海洋史」（New Qing maritime history）之一例。

---

172 《清太宗實錄》，卷 61，頁 829。

173 《滿文老檔》，太宗第 1 冊，頁 143。

174 李善愛，〈透過禮儀看皇太極時期對蒙關係以及「外藩（tulergi golo）」概念的形成〉，《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1 期，頁 47-57。

175 Ronald C. Po, "Mapping Maritime Power and Control: A Study of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Qisheng Yanhai Tu (A Coastal Map of the Seven Provinces)," *Late Imperial China*, 37:2 (December 2016), pp. 93-136.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北方邊口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平圖 020857。

〈北洋海岸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平圖 021554。

《明憲宗實錄》、《明神宗實錄》、《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影印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

《清實錄．滿洲實錄》、《清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朝鮮太宗實錄》、《朝鮮世祖實錄》、《朝鮮宣祖實錄》、《光海君日記》、《朝鮮仁祖實錄》，均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東國文化社，1955-1958，影印國編本。

〔明〕毛霦，《平叛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55，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影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毛貢刻本。

〔明〕李東陽纂，〔明〕申時行重修，《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

〔明〕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91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宋氏漫堂抄本。

〔明〕徐渭，《徐文長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3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明刻本。

〔明〕徐渭，《徐文長逸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3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明天啓三年（1623）張維城刻本。

〔明〕張天復，《皇輿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166，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1588）張象賢遐壽堂刻本。

〔明〕陸鏊、〔明〕陳烜奎纂修，崇禎《肇慶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冊 16，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影印明崇禎十三年（1640）刻本。

〔明〕黃鳳翔，《田亭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3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1612）刻本。。

〔清〕方汝翼、〔清〕賈瑚修，〔清〕周悅讓、〔清〕慕榮榦纂，光緒《增修登州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冊 48，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影印清光緒七年（1881）刻本。。

〔清〕佚名，《山東海疆圖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22，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影印清抄本。。

〔清〕佚名，《瀋館錄》，收入金毓黻主編，《遼海叢書》，冊 4，瀋陽：遼瀋書社，1985。

〔清〕馬齊、〔清〕馬爾漢等撰，《御製清文鑑》，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
安雙成、屈六生主編，《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冊 1，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希都日古編譯，《清內秘書院蒙古文檔案匯編漢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東京：東洋文庫，1955-1963。
汪前進編選，《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冊 5，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

二、專著

吳政緯，《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
松浦章編著，《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的交流——朝鮮使節與漂着船》，臺北：樂學書局，2002。
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梁二平，《中國海圖史（前 310-1931）》，香港：開明書店，2021。
陸傳傑，《被誤解的臺灣古地圖》，臺北：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
菊池勇夫編，《蝦夷島と北方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劉小萌，《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盧雪燕主編，《故宮典藏古地圖選粹》，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8。
濮德培（Peter C. Perdue）著，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新北：衛城出版，2021。
謝國興、陳宗仁主編，《地輿縱覽：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中文古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8。
Akin, Alexander. *East Asian Cartographic Print Culture: The Late Ming Publishing Boom and its Trans-Regional Connection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1.
Crossley, Pamela Kyle.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lliott, J. H.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Hostetler, Laura.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Mosca, W. Matthew.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Olarte, Mauricio Nieto. *Exploration, Religion, and Empire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Ibero-Atlantic Worl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2.

三、論文及專文

孔令偉，〈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92 本 3 分，2021 年 9 月，頁 603-648。

毛傳慧，〈近代早期法國的遠東貿易與國家工商業發展——「傳教、貿易、科技考察」政策〉，《季風亞洲研究》，期 8，2019 年 4 月，頁 1-62。

王志強，〈《金國汗黃台吉與海島劉興治等告天盟書》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 年第 2 期，頁 59-69。

王開隊，〈從地理文獻看明代地理學的發展趨向〉，《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 年第 4 輯，頁 116-123。

王學玲，〈在地景上書寫帝國圖像——清初賦中的「長白山」〉，《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27，2005 年 9 月，頁 91-121。

任金城、孫果清，〈關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發現的一張十六世紀的中國地圖〉，《文獻》，1986 年第 1 期，頁 145-162。

安洙英，〈朝鮮後期西方地圖的傳入與影響〉，《世界歷史評論》，2021 年第 4 期，頁 151-169、轉頁 293-294。

成一農，〈經典的塑造與歷史的書寫——以《廣輿圖》爲例〉，《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4 期，頁 174-183。

何孟興，〈洗島靖海：論明初福建的「墟地徙民」措施〉，《興大歷史學報》，期 22，2010 年 2 月，頁 1-20。

吳雪娟，〈清代滿文輿圖概述〉，《滿語研究》，2006 年第 2 期，頁 49-52。

吳雪娟，〈新發現的滿文本《黑龍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圖》〉，《東北史地》，2007 年第 3 期，頁 72-75。

吳雪娟，〈論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的命名〉，《滿語研究》，2019 年第 1 期，頁 92-100。

呂妙芬，〈明代吉安府的陽明講會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5，2001 年 6 月，頁 197-268。

李紀祥，〈輿圖史與接受史中的海國與大地——清季世界新圖之分型〉，《輔仁歷史學報》，期 22，2009 年 1 月，頁 27-94。

李善愛，〈透過禮儀看皇太極時期對蒙關係以及「外藩（tulergi golo）」概念的形成〉，《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1 期，頁 47-57。

沈玉慧，〈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的琉球情報收集〉，《漢學研究》，卷 29 期 3，2011 年 9 月，頁 155-190。

沈玉慧，〈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臺大歷史學報》，期 50，2012 年 12 月，頁 109-153。

沈玉慧，〈朝鮮王朝海外知識的形成與累積——以《輿地圖．朝鮮日本琉球國圖〉爲例》，《故宮學術季刊》，卷 34 期 2，2016 年 12 月，頁 107-163。

承志，〈満洲語で記された「黒龍江流域図」〉，收入藤井讓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編，《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 193-222。
承志，〈尼布楚條約界碑圖的幻影——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卷 29 期 1，2011 年 12 月，頁 147-236。
承志，〈滿文《烏喇等處地方圖》考〉，*Central Asiatic Journal*, 59:1-2 (2016), pp. 179-238.
林士鉉，〈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院藏滿、漢文《臺灣略圖》簡介〉，《故宮文物月刊》，期 349，2012 年 4 月，頁 40-48。
林士鉉，〈極東邊民：《皇清職貢圖》裡的庫野〉，《民族學界》，期 45，2020 年 4 月，頁 107-158。
林基中，〈17 世紀的水路《燕行錄》與登州〉，收入陳尚勝主編，《登州港與中韓交流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頁 143-157。
林開強，〈清王朝國家將愈邊界意識簡析〉，《社會科學研究》，2010 年第 1 期，頁 160-162。
柳岳武、許文霞，〈清初朝鮮「倭情報告」政策之研究〉，《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6 期，頁 75-79。
孫果清，〈罕見的大幅彩繪全國地圖——王泮題識《輿地圖》鑒賞〉，《地圖》，2009 年第 1 期，頁 134-135。
孫靖國，〈《山東至朝鮮運糧圖》與明清中朝海上通道〉，《歷史檔案》，2019 年第 3 期，頁 61-65。
孫靖國，〈《江防海防圖》再釋——兼論中國傳統輿圖所承載地理信息的複雜性〉，《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6 期，頁 21-31。
孫衛國，〈登萊事變及其對明、後金與朝鮮的影響〉，收入陳尚勝主編，《登州港與中韓交流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119-142。
徐光台，〈明末清初西方世界地圖的在地化：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與熊人霖「輿地全圖」考析〉，《清華學報》，新卷 46 期 2，2016 年 6 月，頁 319-358。
秦國經，〈18 世紀西洋人在測繪清朝輿圖中的活動與貢獻〉，《清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37-44。
張存武，〈朝鮮人所知的盛世琉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0，1998 年 12 月，頁 1-27。
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卷 27 期 3，2009 年 9 月，頁 169-256。
張虹，〈老滿文改革的初始時間〉，《滿語研究》，2006 年第 2 期，頁 28-31。
張華克，〈《滿州實錄》前三卷插圖內容解析（上）〉，《中國邊政》，期 222，2020 年 12 月，頁 135-176。
張華克，〈布勒瑚里湖考略〉，《中國邊政》，期 208，2016 年 12 月，頁 119-158。
陳宗仁，〈Mr. Selden's Map 有關日本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收入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8，頁 341-384。

陳宗仁，〈Selden Map 有關臺灣與琉球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兼論北港與加里林的位置與地緣意涵〉，《臺灣史研究》，卷 27 期 3，2020 年 9 月，頁 1-42。

陳柏溢、陳冠至，〈清代紹興府藏書家之社會網絡分析〉，《圖資與檔案學刊》，卷 13 期 1，2021 年 2 月，頁 83-131。

陳慧宏，〈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時代的視覺物像及傳播網絡〉，《新史學》，卷 21 期 3，2010 年 9 月，頁 55-123。

陳慧宏，〈利瑪竇研究的過往及思考：兼論幾本新著及利瑪竇史料〉，《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卷 10 期 1，2013 年 6 月，頁 261-297。

游棨文，〈朱燮元的家世與早期官宦經驗（1566-1620）〉，《史匯》，期 19，2016 年 6 月，頁 153-178。

黃一農，〈吳橋兵變：明清鼎革的一條重要導火線〉，《清華學報》，卷 42 期 1，2012 年 3 月，頁 79-133。

黃一農，〈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漢學研究》，卷 20 期 1，2012 年 6 月，頁 131-161。

黃文樹，〈陽明後學與利瑪竇的交往及其涵義〉，《漢學研究》，卷 27 期 3，2009 年 9 月，頁 127-158。

黃時鑒，〈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百年回顧〉，《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2 期，頁 119-122。

黃時鑒，〈從地圖看歷史上中韓日「世界」觀念的差異：以朝鮮的天下圖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圖爲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3 期，頁 30-41。

黃普基，〈明清朝鮮使者筆下的山海關〉，《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4 期，頁 81-85。

黃麗生，〈明代萬曆時期的島嶼議題：以《明實錄》爲中心〉，《海洋文化學刊》，期 21，2016 年 12 月，頁 1-37。

楊雨蕾，〈利瑪竇世界地圖傳入韓國及其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5 年第 1 輯，頁 91-98。

楊雨蕾，〈登州與明代朝鮮使者——以《朝天錄》爲中心〉，收入陳尚勝主編，《登州港與中韓交流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158-172。

楊雨蕾，〈明清朝鮮文人的江南意象〉，《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6 期，頁 141-149。

楊雨蕾，〈關於「王泮題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的韓國藏本〉，《文獻》，2012 年第 4 期，頁 127-139。

楊雨蕾、鄭晨，〈多元的認識：韓國古輿圖中的琉球形象〉，《海交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頁 40-56。

楊普景，〈17 世紀朝鮮本天下輿地圖의考察〉，收入藤井譲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主編，《絵図・地図からみた世界像》，京都：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2004，頁 180-189。
葉高樹，〈滿洲親貴與清初政治：都英額地方赫舍里家族的個案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43，2010 年 6 月，頁 173-230。
葉高樹，〈滿洲軍事家族與清初政治：長白山鈕祜祿家族的個案研究〉，期 46，2011 年 12 月，頁 169-230。
管東貴，〈整體觀與歷史研究——以中國古代封建制的變遷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25，1997 年 6 月，頁 1-14。
趙志強，〈老滿文研究〉，《滿語研究》，2003 年第 2 期，31-38。
劉承軍，〈清代開國政權意識形態探析——以清太祖、太宗正統觀為中心的考察〉，《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12 年第 11 期，頁 79-82。
劉厚生，〈評皇太極在明清決戰前夕的重大舉措——從滿文《天聰九年檔》所見〉，《中國邊政》，期 170，2007 年 6 月，頁 149-155。
劉曉生、王超傑，〈明季肇慶知府王泮手跡考〉，《文化雜誌》，期 99，2016 年，頁 98-103。
蔡偉傑，〈論清朝滿漢二元文化結構的形成與其意義〉，《中國邊政》，期 170，2007 年 6 月，頁 81-108。
鄧國亮，〈田州事非我本心——王守仁的廣西之役〉，《清華學報》，新卷 40 期 2，2010 年 6 月，頁 265-293。
鄭永昌，〈時代印記——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洋海岸圖〉試析〉，《故宮文物月刊》，期 488（2023 年 11 月），頁 18-27。
黎志添，〈清代道光年間廣州城區祠廟的空間分佈及其意涵：以道光十五年「廣州省城全圖」為考察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期 63，2016 年 7 月，頁 151-201。
盧正恒、黃一農，〈先清時期國號新考〉，《文史哲》，2014 年第 1 期，頁 66-74。
盧正恒，〈清代滿文避諱：兼論乾隆朝避諱運用實例〉，《清華學報》，新卷 48 期 3，2018 年 9 月，頁 489-524。
盧正恒，〈賊諜四出廣招徠：鄭氏諜報網、清帝國初期的東南海島認識與《臺灣略圖》〉，《臺灣史研究》，卷 26 期 1，2019 年 3 月，頁 1-58。
盧雪燕，〈地理之學，非圖不明——故宮所藏古地圖探微〉，《地圖：中華民國地圖學會會刊》，期 17，2007 年 9 月，頁 109-124。
盧雪燕，〈明彩繪本《甘肅地方圖》考〉，《故宮學術季刊》， 卷 29 期 1，2011 年 9 月，頁 101-146。
盧雪燕，〈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彩繪本《山西邊垣圖》與《山西三關邊垣圖》考述〉，《故宮學術季刊》，卷 30 期 4，2013 年 6 月，頁 105-153。
盧雪燕，〈彩繪本滿漢文《甘肅地圖》考〉，《故宮學刊》，輯 10，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頁 440-457。

蕭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帝國與邊緣：1644 年至 19 世紀清朝與日本及琉球關係比較研究〉，收入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226-245。

戴琳劍，〈燕岩朴趾源的海洋認識管窺〉，《赤峰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11 期，頁 138-140。

薛月愛，〈東北地區歷代輿圖繪製情況初探〉，《齊齊哈爾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 年第 5 期，頁 113-115。

薛月愛，〈康熙《皇輿全覽圖》與乾隆《內府輿圖》繪製情況對比研究——以東北地區爲例〉，《哈爾濱學院學報》，2008 年第 10 期，頁 102-106。

韓曉梅，〈從軍機處滿文寄信檔看乾隆帝規範清文的使用〉，《滿族研究》，2003 年第 3 期，頁 63-70。

魏巧燕，〈《乾隆內府輿圖》滿語地名探析〉，《滿語研究》，2011 年第 2 期，頁 11-15。

羅樂然，〈東亞文化圈視野下朝鮮後期對澳門的認知〉，《成大歷史學報》，號 50，2016 年 6 月，頁 1-36。

Aksan, Virginia H., and Daniel Goffman. “Introduction: Situating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World.” In Virginia H. Aksan and Daniel Goffman, eds,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s: Remapping the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0.

Biggs, Michael. “Putting the State on the Map: Cartography, Territory, and European State Form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1:2 (April 1999), pp. 374-405.

Chester, Lucy P. “The Mapping of Empire: French and British Cartographies of India and the Late-Eighteenth Century.” *Portuguese Studies*, vol. 16 (2000), pp. 256-275.

Dados, Nour Nicole. “Mapping Empir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Governmen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Empire.” In Alena Strohmaier and Angela Krewani, eds., *Media and Mapping Practic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oducing Space*.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27-44.

Douglas, Bronwen. “Imagined Futures in the Past: Empire, Race, and Nation in the Mapping Oceania.” In Warwick Anderson, Miranda Johnson, and Barbara Brookes, eds., *Pacific Futures: Past and Present.*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8, pp. 131-154.

Elliott, Mark C.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3 (August 2000), pp. 603-646.

Hellman, Lisa. “Drawing the Lines: Translation and Diplomacy in the Central Asian Borderland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82:3 (2021), pp. 485-501.

Hopkins, A. G. “Globalization-An Agenda for Historians.” In A. G. Hopkins, ed.,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pp. 1-11.

Hostetler, Laura. "Global or Local? Explo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o. 26 (2007), pp. 117-135.

Kim, Seonmin. "Ginseng and Border Trespassing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Late Imperial China*, 28:1 (June 2007), pp. 33-61.

Millward, James A. "'Coming onto the Map': '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Empire in Xinjiang." *Late Imperial China*, 20:2 (December 1999), pp. 61-98.

Morar, Florin-Stefan. "Relocating the Qing in the 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 The Manchu Translation of the 1603 World Map by Li Yingshi and Matteo Ricci." *ISIS*, 109:4 (December 2018), pp. 673-694.

Norihito, Mizuno. "China in Tokugawa Foreign Relations: The Tokugawa Bakufu's Perception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Ming-Qing China."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 15 (2003), pp. 108-144.

Padrón, Ricardo. "A Sea of Denial: The Early Modern Spanish Invention of the Pacific Rim." *Hispanic Review*, 77:1 (Winter 2009), pp. 1-27.

Po, Ronald C. "Mapping Maritime Power and Control: A Study of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Qisheng Yanhai Tu (A Coastal Map of the Seven Provinces)." *Late Imperial China*, 37:2 (December 2016), pp. 93-136.

Reidy, Michael S. "From the Oceans to the Mountains: Spatial Science in an Age of Empire." In Jeremy Vetter ed., *Knowing Global Environments: 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Field Scienc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7-38.

四、網路資源

〈天下輿地圖〉，法國國家圖書館藏，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2504834s/f1.item.zoom （2022 年 12 月 20 日檢索）。

〈航海朝天圖〉，https://blog.daum.net/gofor99/457 （2022 年 8 月 1 日檢索）。

《明成化十年甲午科浙江鄉試錄》、《明成化十四年戊戌科進士登科錄》，均收入《中國譜牒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22 年 8 月 5 日檢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Making and Imagining Seas: "Beiyang Hai'an Tu"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as during the Later Jin Period

Cheng-heng Lu*

Abstract

The map "Beiyang hai'an tu" 北洋海岸圖, held b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vers Korea, Northeastern China, Shandong, Zhili, and the regional sea waters, with the names of places being written in both Manchu and Chinese.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been aware of this map, but only introducing its contents to a limited extent. Many issues, including its dating as well a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refore await further research. The present article argues that "Beiyang hai'an tu" was drawn between 1632 and 1634 based on "Wang Pan tizhi yudi tu" 王泮題識天下輿地圖, a map produced in Korea around the 1610s or 1620s which was likewise a reproduction of "Yudi tu" by Bai Jun 白君 (?–?) of Shanyin from the late 16th century. The period of 1632 to 1634 coincides with when Emperor Hong Taiji of the Later Jin dynasty and founding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 (r. 1636–1643) shifted maritime policy towards active occupation by taking the Dongjiang Islands. Furthermore, this map depicts the shaping of the geographic and cultural world of the Later Jin; that is, instead of adop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smological notion of the four seas under heaven, the Later Jin, as this map suggests, founded a three-seas cosmology to establish its legitimacy. This article thus expounds "Beiyang hai'an tu" within the frameworks of knowledge exchange as well as the realities of military affairs, politics, and culture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of empire-building during the Later Jin period.

Keywords: cartography, Qing history, Ming-Qing transition, knowledge exchange in East Asia

*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